

## 明代中葉太湖以東地區的 市鎮發展與地區開發

范毅軍\*

市鎮的出現與擴張，代表一個地區的開發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為瞭解明中葉（1550年為止）江南地區的情況，本文選擇以其核心所在的蘇州府、松江府、太倉州，也就是太湖以東的蘇南地區為研究範圍，以市鎮數量的增減、分佈及個別鎮的規模作為分析的對象，藉以蠡測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概況。

綜合市鎮的各種特質，顯現直到明中葉為止的蘇南地區，仍富有濃厚的拓殖性色彩。將蘇南分成鹽鐵塘主幹區、淀南浦東區和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三大塊，這種特性在鹽鐵塘主幹區最為明顯。當地主要是古海岸線構成的岡身及其以東地區，不適稻作，地利澆薄。但宋元之際傳入棉種及棉織技術以後，地得以盡其利，轉而從蘇州地區吸引移民東向拓墾，一直到明中葉而不止。此可視為推進明清江南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股重要的動力。

關鍵詞：市鎮 地區開發 明中葉 蘇州府 松江府 太倉州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作為明清社會經濟研究的一支，一九八〇年代新興的明清江南市鎮研究，在中國大陸曾蔚為顯學。市鎮作為主要社會經濟活動發生所在的實體結構，其興起誠可謂是社會經濟發展最具體的一種徵候與指標，研究市鎮本是重新檢討明清社會經濟性質的一個重要契機，然而，在廣泛論證市鎮蓬勃興起這一現象之後，一般研究對當時社會經濟情況的認知，多又歸結到盛極一時的「資本主義萌芽」論這一舊命題上去，並予以單純的肯定。結果，在新研究取向下，論者連篇累牘所獲致的成果，卻不免是為舊詮釋加上一個新的註腳而已。

欲正確理解明清社會經濟的特質，擺脫如「資本主義萌芽」論這樣一種思考模式實有其必要，但同樣仍要面對萌芽論者所廣泛觸及的一些基本課題。不過，若能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更張，特別是從中國自己的歷史脈絡著眼，不捨本逐末受「資本主義萌芽」這個理論所蘊含的西方歷史發展性質所拘束，實事求是，爾後再參照其它社會的發展模式與經驗作對比分析，徐圖歸納出對明清社會較適當的一個詮釋亦不遲。

基於上述構想，筆者近年來對明清社會經濟的認知，選擇以江南市鎮為探索的重點。認為市鎮是主要社會經濟活動賴以發生的有形實體，此尤其在江南地區，其本身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變化，往往可反映以及作為具體量測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指標。雖然到目前為止，相關明清江南市鎮的論著已多，但正如筆者在一篇綜評中所持的觀點，其待探索與反思的空間仍大。<sup>1</sup> 要言之，絕大多數既有的市鎮研究，在時間上多把近代開港通商以前的明清渾然一體觀之，而對於市鎮此起彼落，在一定地域範圍內持續的變化，也多疏於系統性的論證，此可謂對市鎮發展的時空關係有欠釐清。有鑑於此，筆者晚近一系列的研究，一方面盡可能化傳統文獻史料所涵攝的市鎮訊息，如其大小、數量等，成為可量化分析的基礎；另一方面則特別注重江南市鎮在時空結構中的變化及其影響。<sup>2</sup> 基本上，這

<sup>1</sup> 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9.3(1998)：87-134。

<sup>2</sup> 在一系列研究中，筆者前已有〈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一文，從明中葉以來迄一九八〇年代，以蘇南地區為限，就其市鎮發展所蘊含的幾項要素作全面量化的分析。見范毅軍，〈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3(2002)：443-552。此外又有〈市鎮分佈與地域的開發——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一文，著重呈現明清蘇州府、松江府與太倉州地區內，市鎮於各地興衰起落與分佈的大致趨向。見范毅軍，〈市鎮分佈與地域的開發——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大陸雜誌》102.4(2001)：160-191。

些研究注重一般性原則的歸納與分析，而疏於就個別事例作具體的論述。凡所涉及的市鎮，通常均視為一個計量的單位而已。有關個別鎮歷史發展的過程及與之相關的具體活動內容等，則全然未有觸及。此外，既有研究對個別市鎮與所在周邊地區之間的互動，也幾乎無所著墨。本文則將轉以此為敘事的重點。

本文探討時間下迄一五五〇年止，乃是做為筆者一系列研究明清市鎮與地區開發的起始階段。<sup>3</sup> 當時蘇、松、太境內包括蘇州與松江府城、太倉州城、各縣縣城，以及在地方志市鎮欄中凡有記錄可查，名之為市，或市、鎮兼而名之的各種商業性聚落，大大小小總共有一百六十一個。這些成鎮以前作為一個單純的聚落，有可以上溯到明初或甚至宋元以上的。換言之，這些鎮迄一五五〇年止的現況，可說是集歷年演化的總其成。而一五五〇年前後也適逢一般所謂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開端，這一百六十一個大大小小的市鎮，究其起源、發展與分佈，正可展現江南核心區當時社會經濟的具體實況。這不啻是對未來繼續檢討下迄十九世紀中葉延續達三百年以上的明清社會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可靠的，可資前後比較的基準。

由於本文側重瞭解各市鎮在蘇、松、太地區分佈的狀態及其與周邊的關係，除了探討市鎮本身規模與相關的活動內容外，確切掌握所有市鎮所在及其相互的位置關係是必要的前提。因此，在筆者另文〈市鎮分佈與地域的開發——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附圖四的基礎上，<sup>4</sup> 進一步整合〈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一文附錄二所列各市鎮屬一、二、三級大小，或為府、縣城所在之屬性，<sup>5</sup> 另合成一個到一五五〇年止，均賦以等級大小的市鎮分佈圖（見圖一）。本圖以及據其進一步合成如下所述的圖二，將作為本文以下諸多論述的基本憑藉。

如圖一所見，到一五五〇年止，蘇、松、太地區的市鎮，稀稀落落地散佈在境內各地。由於該圖僅標示一些較重要的水系，因此，有些鎮從圖上看來，似乎

<sup>3</sup> 筆者一系列有關明清蘇、松、太地區市鎮的研究，在時段上基本劃分為第一期明中葉（1550年以前）、第二期明末清初（康熙朝結束之年）（1551-1722）、第三期清中葉到開港通商之際（1723-1861）、第四期清末開港通商以後（1862-1911）、第五期民國時期（1912-1949）、第六期1949以後（1950-1980年代）六大階段。以下文中如有提到市鎮發展的分期時，均以此為準。

<sup>4</sup> 范毅軍，〈市鎮分佈與地域的開發——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頁180-181。

<sup>5</sup> 有關市鎮一、二、三級的分類標準，在頁155中會有所說明。

遠離河湖而立，其實則不然。當地幾乎所有鎮與鎮甚至鎮、村之間，皆有水路相通。<sup>6</sup> 不過，根據水運交通暢達的程度而言，市鎮當時分佈的型態，大致上可以歸納成點狀和帶狀兩種特徵。前者主要見於淀浦河以南的松江縣境以及黃浦江以東和以南的上海市東部、川沙、南匯、奉賢和金山各縣（此處及以下所指的縣市，除有特別說明外，均以現代五萬分之一地圖上所勾勒出的民國時的縣市界為準，並非明清時的行政區劃）。市鎮錯落其間，雖然有些去主要水路亦不遠，但多數市鎮必須仰賴次要或其它交通途徑彼此聯繫，故呈相對孤立之勢。此區以外，市鎮則主要沿幾條南北和東西向的水路要道成帶狀的分佈。這些水路由西向東以及由北至南，依次是：一、大運河；二、元和、福山塘；三、鹽鐵塘；四、梅李塘；五、白茆塘；六、七浦塘；七、楊林塘；八、劉河；九、練祁塘；十、吳淞江；十一、淀浦河。介於其間離這些河道較遠的地方，市鎮之分佈極為疏闊。有大片地區以幾近於一片空白形容之亦不為過。為方便討論，依據市鎮分佈特性以及涵蓋上述水路的個別範圍，可以把整個蘇、松、太地區進一步歸納成：一、鹽鐵塘主幹區；二、淀（淀浦河）南浦（黃浦江）東區；三、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三大塊及其中的各小區塊（見圖二各分色區塊）。以下擬分區就個別市鎮發展及其與周邊地區的關連性進行探索，從而理解到一五五〇年前後，蘇南地區整體開發的實情。

## 一、鹽鐵塘主幹區

本區涵蓋範圍大略指蘇、松、太湖泊密集區以東、以北，淀浦河以北和黃浦江以西，也就是前所指的第二和第三區所圍繞的地帶。該區頂部今天是長江口南岸的一大塊海埔新生地。由福山鎮（常25，常指常熟，數字則為該鎮在圖一、二上的編號，乃便於讀者隨時查找參閱。以下皆同）一路東南下，有鹽鐵塘加上與其相接的支流最終與淀浦河相交。此外，以蘇州地區為源點，輾轉經湖群低地區注入海的各主要河渠包括：梅李塘、白茆塘、七浦塘、楊林塘、劉河、練祁塘、吳淞江和淀浦河，則形同肋骨般在本區的中間地帶與鹽鐵塘交會。到一五五〇年止，所有蘇、松、太地區陸續出現的一百六十一個市鎮，其中有八十三個也就是

<sup>6</sup> 參見范毅軍，〈市鎮分佈與地域的開發——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圖二及其相關討論。



佔總數的52%，都聚集在這一區內。其中絕大多數又都沿鹽鐵塘及與之交會的各幹流分佈。

自古以來蘇南地區的海岸線不斷東移，鹽鐵塘以東為舊海岸沉積的所謂岡身高區，明清時代以種植棉花為主。鹽鐵塘以西地勢較低，以產米為大宗。明中葉時鹽鐵塘為「往來運道所繫，……民間輸將貿易與夫上司巡歷往來出入通衢」，<sup>7</sup>與之交會的梅李塘、白茆塘、七浦塘、楊林塘以及劉河等，也都是商貿流通的要道，當地市鎮就嵌在一個以重要河川運道為主的基本框架上。在這樣一個空間架構下，根據市鎮分佈的地緣傾向，鹽鐵塘主幹區又可以進一步細分成：一、長江口南岸沙洲區；二、梅李與楊林塘區；三、劉河與吳淞江中下游區；四、淀浦河流域。其地市鎮發展與區域開發的關係將如下述。

### （一）長江口南岸沙洲區

長江口南岸沙洲區內純以沙洲為主的自然地貌，本以常熟縣北端鄰近江口的海埔新生地為限。但其地與以南一直到常熟縣城附近的虞山、尚湖和官塘為界範圍，地勢與其它地區略呈相對孤立性，本區因此涵蓋常熟縣城西北，一直到長江這一範圍。從地質上言，常熟北部福山（常25）和慶安鎮（常11）一線，大致構成地質學家所稱的古長江岸線。該線南部屬老長江三角洲的古代沙嘴區，成陸已有七千年以上。北部屬新長江三角洲，現今幾乎全部已劃歸一九六二年以後新設立的沙洲縣管轄。這一部份原由浮出江面的數十個沙洲積漲連接而成，其中成陸最早的距今只約八百年，相當於宋元時期，其它則大部份形成於清末以後。<sup>8</sup>直到一九六〇年代，其地仍普遍具有一般海埔新生地所共有的特徵，也就是河、浦、港、汊分佈繁密且井然有序，充分顯示該地仍屬於一個很活躍的圍墾地帶。<sup>9</sup>

迄一五五〇年止，本區先後共出現七個市鎮。僅有慶安、奚浦（常13）和福山三個鎮尚有些許資料可供討論。巧的是，這三個鎮都沿著上述古長江岸線分佈。明代該線以外地區多還在水線以下，因此，這三鎮當時等於就在江邊上。慶

<sup>7</sup> 萬曆《嘉定縣志》（萬曆三十三年〔1605〕），頁909-910。

<sup>8</sup> 《沙洲縣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頁3及所附沙洲縣成陸示意圖。

<sup>9</sup> 此據現代五萬分之一的地圖上觀測所見。見聯合勤務總司令部，《江蘇省五萬分之一地形圖》（臺北，1970-1990）。

安鎮舊名石閘市，宋元豐（1078-1085）年間改稱鎮。<sup>10</sup> 明早期曾在此設黃泗浦巡檢司，鎮內部的實況則不得而知。嘉靖年間（1522-1566）鎮毀於倭寇。<sup>11</sup> 其後鎮的相關歷史乃杳無痕跡。一直到光緒年間的《常昭合志稿》中才再有記錄：「今存街一道，居民百餘戶」。<sup>12</sup> 既然史料的欠缺顯現鎮的早期歷史似不足道也，而鎮後來規模又如此之小，估計該鎮宋元以來的發展有限，明嘉靖以後雖不必然盡退化為村，卻也不太可能再有所擴張。挾此前後兩端研判，鎮在明中葉毀於倭寇前的規模當亦有限，其地長期以來雖一直有市鎮之名，但商業方面的重要性可能是微不足道。

表一：明中葉（1550年止）位於長江口南岸沙洲區的市鎮

	1	2	3	4	5	6	7
圖一市鎮 代號	常11	常13	常18	常19	常25	常28	常31
市鎮名稱	慶安鎮 (石閘市)	奚浦市	西唐市 (塘墅) (瀆東)	西塘橋鎮 (塘橋)	福山鎮	河陽市	徐家市 (西徐市) (新市)

奚浦鎮據說於明正統（1436-1449）年間由居民錢氏所創，這很可能就是初創市場的意思。<sup>13</sup> 正德（1506-1521）初的《姑蘇志》說當地：「北通大江（長江），饒魚鹽之利」。<sup>14</sup> 世宗嘉靖年間，該鎮聚居可三百家，中有磚砌街道，並有商舶與江北的通州、泰州來往。入清以來，只有乾隆《蘇州府志》重複《姑蘇志》的記載：「北通大江，饒魚鹽之利」，而不增添一詞。<sup>15</sup> 其它幾種地方志都只登錄其名罷了。二十世紀以後的地方志則連其名亦不可得也。該鎮後來極可能

<sup>10</sup> 正德《姑蘇志》（正德元年〔1506〕），18：15b-16a。

<sup>11</sup> 單樹模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詞典·江蘇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133。

<sup>12</sup> 光緒《重修常昭合志稿》（光緒三十年〔1904〕），頁184。

<sup>13</sup> 間接證據顯示奚浦鎮在正統年間已有錢氏居此並為大姓。既為鎮，故判斷其已有市，此當又與錢姓家族有一定的關連。見嘉慶《常昭合志》（嘉慶二年〔1797〕），2：4a-b；2：43a-b。

<sup>14</sup> 正德《姑蘇志》，18：15b。

<sup>15</sup> 乾隆《蘇州府志》（乾隆十三年〔1748〕），19：15b-16a。

完全喪失了作為一個商業性聚落的地位。因此，不僅在明中葉，即使到後代，鎮的發展亦有限。

早期江邊三個鎮，後來唯獨福山在明清社會經濟活動中值得注意。時至今日也還是常熟市（原縣已升格為市）僅有的兩個市屬鎮之一。<sup>16</sup> 其成鎮歷史遠比前兩個鎮悠久的多。早於唐天祐元年（904）官府即在其地築金鳳城戍守，以便控扼江道。後梁乾化三年（913）改名福山。後周顯德五年（958）正式稱鎮。當時顯然仍以海防而非商業機能為重。<sup>17</sup> 又數百年到明嘉靖年間，當地居民竟可達到二千餘家，是明中葉蘇、松、太地區諸方志中罕見的大鎮。福山鎮原本經福山塘與元和塘一線可下達蘇州城，而當時也的確有商舶經其地來往於江北通州、泰州和江南蘇州、湖州之間。<sup>18</sup> 這表明福山鎮不但已具有濃厚的商業色彩，而且還可能在江南與江北之間的貿易往來中，扮演一個橋樑的角色。

筆者前在〈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一文，把明清江南市鎮依人口多寡分為三級，凡有戶300或口1,500以下者為第一級鎮；戶300至500或口1,500至2,500者為第二級鎮；戶500或居民數達2,500人以上為第三級大鎮。如果史料無誤，福山到明中葉時作為一個三級鎮當綽綽有餘。同時代的慶安與奚浦即使從寬認定，也可能只是二級鎮而已。

福山終明清之世大體都維持三級鎮的規模。其所以與另外兩個鎮的際遇大有分殊，自然地理要素很可能起了關鍵的作用。慶安與奚浦兩個鎮原本位於江邊，但隨江岸不斷地向前延伸，通江的便利漸減，商業機能的日益消退自可預期。福山則不然，三鎮中其地較偏外側，受水流重力的影響，長期以來長江口地區的沙積淤漲趨勢，基本上是向北而非向西，對其影響並不大。即使今天福山鎮仍然傍江海而立。既然作為與江北對渡口岸的機能一直不減，而另外兩個鎮原有的功能又可能陸續轉移過來，取地利之便，福山遂確立其成為蘇南與江北往來最北的一個通商要口的地位，這應該是其遠在明中葉就可以號稱有居民二千餘家，而日後又可以歷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除上述早期濱江三鎮外，到一五五〇年左右，零星散佈於本區內陸的另外四個鎮分別是西塘橋鎮（常19）、西唐市（常18）、河陽市（常28）和徐家市（常

<sup>16</sup> 《常熟市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99-100。

<sup>17</sup> 單樹模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詞典·江蘇省》，頁128。

<sup>18</sup> 嘉靖《常熟縣志》（嘉靖十八年〔1539〕），3：8b-9b。

31)。一九九〇年代出版的《沙洲縣志》稱，西塘橋鎮於明洪武（1368-1398）年間吳江龐氏遷來此地經商乃成集鎮；同書又稱西唐市同樣也於明洪武年間建鎮。<sup>19</sup>另有一說則稱西塘橋鎮始建於清乾隆初。<sup>20</sup>然而該二鎮都僅見於光緒三十年（1904）出版的《重修常昭合志稿》中，商業上均無任何特殊性可言。在此之前各方志中，均無與二鎮有關的記載。據此研判，西塘橋鎮與西唐市即使確實已見於明初，但到明中葉時恐怕也只是微不足道的鎮罷了。

有關河陽市最早的記載確定見於明中葉。一九四九年以後因興修水利，在原址離地面以下三十到五十釐米處發現用宋磚鋪築成的古街遺址，這說明該地成聚落的歷史更為久遠。不過，一九九〇年代的《沙洲縣志》則稱其地早已廢市，確切的年代並未明示。<sup>21</sup>其實，始自明正德元年（1506）版的《姑蘇志》起，直到清嘉慶二年（1797）版的《常昭合志》止，歷代相關的方志也都僅載其名。光緒三十年的《重修常昭合志稿》更連其名亦除去之。看來河陽市雖然在宋代已然成立，入明以來卻仍看不出有任何的重要性，更晚則以衰亡終。該鎮之所以見載於地方志中，可能是聊備一格。

最後，徐家市（西徐市、新市）在正德《姑蘇志》中僅見其名。數十年後到嘉靖年間，雖說聚集可三百家，有商舶，<sup>22</sup>後來在地方志中則長期失載，直到光緒年間才再有記錄。當時說鎮上有「街三道，居民百數十戶」。<sup>23</sup>晚近到一九八〇年代，當地尚稱鎮，但人口僅九百五十多而已。<sup>24</sup>如概略以一家三口計，應有三百戶左右的人家。此規模尚不出前明嘉靖時的水準。如果前明以來鎮的確沒有起過任何劇烈的變化，則其發展真可稱得上是長期遲滯。

要言之，歸納地方志中所提供的訊息，一直到明中葉時，長江口南岸沙洲區內先後共發展出七個市鎮。其中無論在當時或日後於商業機能方面能起較大作用的，不過只是福山一個鎮而已。福山既然作為江南蘇州府、湖州府和江北地區貿易往來的要港，溝通福山與蘇州城之間的福山塘與元和塘，理當是大運河以外，另一條聯繫江南與江北之間的貿易要道。然而，迄一五五〇年止，整個長江口南

<sup>19</sup> 《沙洲縣志》（1992），頁144, 146-147。

<sup>20</sup> 單樹模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詞典·江蘇省》，頁131。

<sup>21</sup> 《沙洲縣志》（1992），頁167。

<sup>22</sup> 嘉靖《常熟縣志》，2：7a-8a。

<sup>23</sup> 光緒《重修常昭合志稿》，頁186-187。

<sup>24</sup> 單樹模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詞典·江蘇省》，頁132。

岸沙洲區中，福山以外的鎮固不足道，即使擴及整個福山、元和塘兩岸上千平方公里的腹地，也就是長江南岸沙洲區再加上部份以後會再提到的湖群低地區，全部大範圍內也不過再多出三個鎮而已。其中值得稱道的只有一個常熟縣城（常79）。另外兩個都是一級的小鎮，也就是有「二百家，中有衢路」的楊尖市（常81），以及僅「百餘家」的練塘市（常88）。<sup>25</sup> 以全區市鎮分佈如此之疏闊，而多數鎮自身的發展又並不顯著觀之，幾乎可以斷言一直到明中葉時，本地人煙所聚以及地利開發都還極為有限才是。與此對照，偏東南的梅李與楊林塘區則稍稍有所不同。

## （二）梅李與楊林塘區

以行政疆界區分，梅李與楊林塘區大體包括了今日的常熟東半以及太倉縣的北半部。（參見圖一、二）全區迄一五五〇年止，總共出現了二十八個市鎮，詳細名單如下表。最北出常熟縣城東北沿梅李塘（尾間稱許浦塘）達於海，沿河有梅李（常56）和許浦（常38）兩個市鎮。這兩個鎮起源頗早並且都和軍事有關。梅李鎮相傳五代時吳越遣將梅世忠和李開山率軍駐此，後漸成市，因取二將之姓為名。宋元豐（1078-1085）年間正式稱鎮。紹聖（1094-1097）時民間曾有諺語：「東鄉十八鎮，梅李第一鎮」。如果這則史料的確出於宋代，則該鎮當時的發展已頗具規模。<sup>26</sup> 關於許浦鎮，其舊址宋時亦有屯兵，曾立水軍寨，軍民市易為盛，紹興（1131-1162）時亦因以成鎮。原址日後因遭海水沖塌沉入海中，鎮乃移到現址。<sup>27</sup> 明中葉地方志中有關許浦的記載異常晦澀不明，而梅李鎮則有具體記錄說居民可達二千餘家。<sup>28</sup> 這就與前述的福山鎮一樣，是當時與蘇南相關之各地方志中，少見的明白指出有如此眾多家戶數的一個大鎮。

<sup>25</sup> 嘉靖《常熟縣志》，2：7a-9b。

<sup>26</sup> 這條史料轉引自單樹模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詞典·江蘇省》，頁125，原始出處不得而知，不過明清地方志中關於梅李鎮都沒有這樣的記載，此處姑引之，但存疑當時真有這種說法。

<sup>27</sup> 正德《姑蘇志》，18：15b-16a。嘉靖《常熟縣志》，3：8b-9b。

<sup>28</sup> 嘉靖《常熟縣志》，3：8b-9b。

表二：明中葉（1550年止）位於梅李與楊林塘區的市鎮

	1	2	3	4	5	6	7
圖一市鎮代號	太1	太2	太4	太10	太11	太16	太20
市鎮名稱	陸河市 (鹿河)	甘草市 (代家灣外海)	璜涇鎮 (璜溪) (趙市)	新安市 (陸公市)	隆市 (浮橋鎮西北)	塗松市	沙頭鎮 (沙溪)
	8	9	10	11	12	13	14
圖一市鎮代號	太21	太22	太23	太25	太26	太27	崑3
市鎮名稱	小市	直塘市	鶴王市 (岳王市) (新市)	茜涇鎮	雙鳳鎮 (雙林)	半涇市 (朱涇)	周市市 (周墅鎮)
	15	16	17	18	19	20	21
圖一市鎮代號	常38	常47	常53	常56	常64	常76	常77
市鎮名稱	許浦鎮 (彭家橋)	薛家市 (大薛家巷)	周家市 (東周市)	梅李鎮	張家市 (東張市) (白茆老市)	老徐市 (東徐市) (徐家市) (李基市)	歸家市
	22	23	24	25	26	27	28
圖一市鎮代號	常87	常92	常95	常99	常100	常114	常118
市鎮名稱	何家市 (管家市) (何市鎮)	戈莊 (花溪里)	李家市	支塘市	花橋市 (朱家)	李市市 (李世鎮) (山涇市)	唐市市 (東唐墅) (尤涇市)

梅李鎮恰好位居東西向梅李塘以及南北向鹽鐵塘兩大交通動脈的交會點上。史志泛稱，明代時如果梅李塘的尾閘許浦塘未塞，通常會有商船由湖州、蘇州沿大運河、元和塘北上，抵常熟縣城後轉東北，繼續沿梅李塘經梅李鎮渡長江與通州、泰州地區往來。<sup>29</sup> 雖然梅李鎮不若福山鎮臨江海而立，離江口還有一段距離，但其商業機能與福山鎮相同。從地圖上看，兩鎮事實上處於蘇南、浙北與江南通州、泰州地區之間商業往來的兩犄角位置。

持續到一五五〇年左右，梅李塘以南一直到楊林塘周圍這一地區，另外聚集有二十六個市鎮。就當時全部蘇南地區而言，分佈還算是相對較密集的一個部份。不過，其中規模較大，在社會經濟活動方面可能扮演較重要角色的，也只有極少數幾個。據前後期史料以及各種間接情況研判，當時可能達到第三級鎮規模的，只有老徐市（常76）、支塘市（常99）和沙頭鎮（太20）三個。

老徐市所在據說於唐代已成聚落，當時名為黃村。明代有徐尚書拭聚族於此。嗣後拭孫昌祚遷居南方四里處另成一聚落，稱新徐市，此地乃改稱老徐市。有一條清嘉道年間的史料，泛指老徐市於明代「商賈湊集，居民萬灶，縉紳巨室之田以億計，糧以萬計。」<sup>30</sup> 這應該是指徐氏遷來此地聚墾以後的事。不過，諸明清方志中直到明嘉靖十八年（1539）版的《常熟縣志》，僅載老徐市由徐氏所創等寥寥數語而未及其它。<sup>31</sup> 之前則均無記載可言。之後，萬曆四十五年（1617）的《常熟私志》則稱其「市易繁盛」。<sup>32</sup> 綜此判斷，一五五〇年以前的老徐市很可能還處在一個新興的階段。即使真有「居民萬灶」那種盛況，理應是後來的事。而且萬灶居民究竟有多少聚居在狹義的鎮區？又有多少散居四鄉之地？還應有所區別。老徐市作為一個市鎮，到萬曆末期既然有「市易繁盛」這種說法，究竟市易繁盛的商品為何？清嘉道年間，里人說：「棉布為我鄉生活之本」。又說：「里睦（老徐市）地屬高鄉，花布為重……」。<sup>33</sup> 顯然花布產銷為地方經濟的首要一環。這種情形推諸明代中葉應該也是如此，只是興旺的程度可能不如後來。

<sup>29</sup> 嘉靖《常熟縣志》，3：8b-9b。

<sup>30</sup> 《里睦小志》（清嘉慶道光年間），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1992），第11集，頁1-2。

<sup>31</sup> 嘉靖《常熟縣志》，2：8a-b。

<sup>32</sup> 《常熟私志》（萬曆四十五年〔1617〕），無頁數。

<sup>33</sup> 《里睦小志》，頁46, 52。



支塘市位於白茆塘與鹽鐵塘的交會處。遠在魏晉南北朝，其地為梁的興國縣治。隋廢。元末張士誠濬白茆塘以洩三吳之水，從而在此地築支塘城，南北跨鹽鐵塘，東西跨白茆塘。明弘治（1488-1505）年間改名支塘市。<sup>34</sup>數十年後，嘉靖十八年版的《常熟縣志》載，支塘已與前述福山和梅李二鎮並列為有兩千人家以上的大鎮。<sup>35</sup>可見其不只在本地，即整個蘇南地區中的地位亦頗為凸出。然而，除了知其歷史久遠以及規模較大外，從現存方志中，卻看不到明代時任何與之有關的經濟活動。清代支塘繼續作為常熟東鄉的一個要鎮，規模續有所擴大。此時就如同老徐市一樣，鎮也以棉布的產銷為重。<sup>36</sup>推之於明代，支塘鎮在商業方面的機能應該相同，再輔以本地優越的地理位置，這可能是促成支塘能日漸成市，一五五〇年前後進而可成為一個三級大鎮的基本原因。

沙頭鎮位於七浦塘北岸，隨著太倉州早期的興廢不定，或屬常熟，或屬太倉。嘉靖十八年版的《常熟縣志》將之列為常熟縣屬，稱其「居民可二千家。中有鰥寡。邑之重鎮也。有商舶」。<sup>37</sup>此可見一五五〇年以前沙頭鎮的規模已可與上述的福山、梅李和支塘鎮各鎮相提並論。相傳沙頭早於唐宋時即已成村，因其東側不及三公里處另有一個更古老的塗松市（太16），兩地乃概括統稱為塗松市。元代至元（1335-1340）年間因在沙頭當地設河泊所，乃有沙頭之名出現。<sup>38</sup>沙頭於明洪武中創市，<sup>39</sup>原因之一是元末張士誠築城於舊塗松市，當地居民不堪疲累，市漸衰，沙頭乃漸轉盛。<sup>40</sup>再過百餘年，到明弘治年間，沙頭「民樂耕桑，富室亦多好事，士習經書，科甲代不乏人」。<sup>41</sup>另一條可能是入清以後的史料則說：「鎮地延袤可數里，多富家巨室，其縉紳學士幾當一州之半。」又說「沙溪（沙頭）異時民居櫛比，崇閭傑屋，以武斷資於鄉者不一姓。」<sup>42</sup>此俱說

<sup>34</sup> 單樹模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詞典·江蘇省》，頁127。

<sup>35</sup> 嘉靖《常熟縣志》，2：8a-b。

<sup>36</sup> 《支溪小志》（乾隆五十三年〔1788〕），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10集，頁22。

<sup>37</sup> 嘉靖《常熟縣志》，2：8a-b。

<sup>38</sup> 《沙頭里志》（乾隆五年〔1740〕），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8集，頁533, 535-536。

<sup>39</sup> 嘉靖《太倉州志》（崇禎二年〔1629〕），頁362-365。

<sup>40</sup> 《沙頭里志》，頁533。

<sup>41</sup> 弘治《太倉州志》（弘治十三年〔1500〕），1：14a-b。

<sup>42</sup> 《沙頭里志》，頁545。

明沙頭有所謂「鎮裨巨族」的特色。這些世家大族先後有瞿、郁、曹、呂、陸、周各姓。其先祖乃由元代開始一直到明末，陸續由鄰近福山鎮、蘇州府城、常熟與崑山縣城以及太倉州城等地移入。<sup>43</sup> 這正可反映以沙頭鎮為中心，周圍一直到明末時，還饒有開發的空間。

沙頭地區「農人耕種，大率花多稻少」。<sup>44</sup> 上述沙頭鎮持續有外來人口移入，日久且可以發家致富，這當與本地棉業的日益發展脫不了關係。另外，沙頭到一五五〇年止就已相當興旺，應該還有一個關鍵的因素，那就是其地正當崇明島與蘇州地區商業往來的孔道。當明中葉婁江逐漸淤塞後，與沙頭密切相關的七浦塘，乃成了溝通崇明與蘇州地區的主要航道。<sup>45</sup> 清代沙頭里人曾追述前代的情況說：「沙頭南遠婁江，北枕虞山，西憑鹽鐵，東控大海，戚浦（七浦）、橫瀝縱橫如十字，……戚浦西承陽城諸河之水，泄瀉於東海，昔年開濬稍深，崇明官民船來往必道沙頭，沙頭居然小都會也。」<sup>46</sup> 此所謂的陽城乃蘇州東側的陽城（陽澄）湖。「西承陽城諸河之水，泄瀉於東海」，指的正是傳統蘇州地區沿橫瀝等，經沙頭到崇明島的這一條貿易路線。如此，沙頭就和上述的福山、梅李鎮一樣，同作為蘇南與蘇北之間商業往來的一個要站，這對其興起當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到一五五〇年止，老徐、支塘、沙頭三大鎮以次，其他二十三個在梅李塘以南到楊林塘周邊這一範圍內的鎮，其中稍具規模可能足以達到二級標準的共有五個，分別是歸家市（常77）、唐市市（常118）、璜涇鎮（太4）、茜涇鎮（太25）和雙鳳鎮（太26）。

歸家市原為村，明前期有名歸椿者移入，獨力濬通白茆埔，闢田數千畝後，人煙聚集，乃改稱市。<sup>47</sup> 一五四〇年代「居民可三百家，中有衢。」<sup>48</sup> 這就是現所見方志有關歸家市到明中葉為止所有的記錄。唐市市於正統（1436-1449）時，由里人唐氏所創。一五三〇年代「聚居可三、四百家，有商舶」。<sup>49</sup> 璜涇鎮相傳

<sup>43</sup> 《沙頭里志》，頁621。

<sup>44</sup> 《沙頭里志》，頁545。

<sup>45</sup> 《太倉縣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頁89。

<sup>46</sup> 《沙頭里志》，頁535-536。

<sup>47</sup> 《四鎮略蹟》（光緒年間），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11集，頁128。

<sup>48</sup> 嘉靖《常熟縣志》，2：8a-b。

<sup>49</sup> 嘉靖《常熟縣志》，2：7a-8a。

在宋元時就已經是一個大鎮。元季遭兵燹，昔時繁華之地乃鞠爲茂草之區。百餘年後到明成化年間（1465-1487），由於世居其地的承事郎趙仲暉「捐資鳩工僦材，構屋數百楹以處流寓，建橋修道路以便往來，於是商賈駢集，貨財輻輳」。<sup>50</sup>從地圖上看，璜涇鎮不同於前述諸大鎮都位於水路要衝，乃孤懸於白茆塘和七浦塘之間，周圍相當範圍內沒有其它鎮市。不過，其地倒的確是發揮著商業的機能：明中葉時，「凡近市三十餘區之民，有而求售者焉，無而求市者焉，蓋不俟營糧負橐，操舟馳騎，遠赴都邑，而不日之間已遂其所求矣」。<sup>51</sup>這反映璜涇當時可能純屬一個地方性的鎮市。其乃應地方供求所需而興，本身發展或可視為周遭地帶日漸開發的一個指標。其實，前所提的唐市市在地圖上看來，也僻處一隅，其之能發展成鎮或亦可作如是觀。茜涇宋代屬軍事上的陽林寨地。明曾置巡檢司和稅務子局於其地。由入清以後茜涇鎮的性質來看，軍事防守作用似乎一直與茜涇有不解之緣。其地僻處海隅，鎮之能成市，主要可能和當地的兵民交易有關，這和一般純商業性聚落隨地域開發、人煙聚集而興，應有所區別。<sup>52</sup>最後雙鳳鎮雖位於鹽鐵塘西側，但與之相去甚近。相傳在明「太祖高皇帝，……蘇之常熟縣東南有雄鎮，曰雙鳳。居民稠密，俗尚儒教，而作興社會」。<sup>53</sup>弘治十三年（1500）版《太倉州志》和正德元年（1506）版《姑蘇志》，都說雙鳳鎮「居民稠密，市物旁午」，<sup>54</sup>卻都沒有指出具體的商業活動內容。地方志又強調鎮內「人多好讀書，故科第代出，甲於諸市。」<sup>55</sup>由於「居民可二千家，……邑之重鎮」的沙頭，就在與其相去不過七公里的地方，經濟方面雙鳳當時的作用可能要從屬其下。雖然鎮在明初就已經有名，但可能一直是一個以耕讀爲重的聚落，到明中葉時充其量或許還只是一個二級的鎮。

明中葉梅李與楊林塘區的其它十八個鎮中，九個一直延續到今天，一個到民國時期。綜合前後期的史料研判，這些鎮雖延續性頗長，但規模始終都不大，大多維持在一級小鎮的規模。只有何家市（常87）、鶴王市（太23）和周市市（崑

<sup>50</sup> 嘉靖《太倉州志》，頁362-365；《璜涇志稿》（道光十年〔1830〕），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9集，頁181。

<sup>51</sup> 《璜涇志稿》，頁181。

<sup>52</sup> 民國《鎮洋縣志》（民國八年〔1919〕），頁58-59。

<sup>53</sup> 民國《太倉州志》（民國八年〔1919〕），頁63。

<sup>54</sup> 弘治《太倉州志》，1：14a-b；正德《姑蘇志》，18：28b。

<sup>55</sup> 弘治《太倉州志》，1：14a-b。

3) 三個，或在清代，或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可能略有成長，但最多也不過是發展成二級鎮而已。其它如薛家市（常47）、戈莊（常92）、李家市（常95）、花橋市（常100）、甘草市（太2）和小市（太21）六個，都不見於一五五〇年以後的地方志中，應該已經廢鎮；隆市（太11）和半涇市（太27）僅續見於明末清初（1551-1722）。所有這些相繼消失的鎮，甘草市場陷入海；小市緊鄰大鎮沙頭，很可能被其所併；其它各鎮周圍，有些日後會形成一些新興的鎮，但規模都不大，時間方面有的且相隔甚遠，因此，幾乎是談不上所謂鎮與鎮之間相互整合或取代的問題。

總之，僅據市鎮分佈的密度研判，明中葉梅李與楊林塘地區似乎要比上述的長江口南岸沙洲區來得發達一些。不過，本區總共近三十個鎮中，規模較大的畢竟也只是很少數幾個罷了。即使是這些較大的鎮，與之相關的經濟活動與實質內容，吾人就現有史料所能知者其實也是微乎其微。其它各鎮要不是規模很小，就是曇花一現而已。如果準此以衡量區域開發的程度，吾人對梅李與楊林塘地區迄明中葉時的發展概況，實宜持審慎保留的態度才是。

### （三）劉河與吳淞江中下游區

綜合各相關方志中所見的記載，劉河與吳淞江中下游區這一範圍內，一五五〇年以前一共出現了三十五個市鎮。從圖一、二來看，鹽鐵塘主幹區內四個小區中，劉河與吳淞江中下游這一區內州縣城集中的程度，頗值得注意。若以鹽鐵塘與練祁塘交會附近為中心，半徑三十公里的範圍內，就有太倉（太36）、崑山（崑6）、青龍鎮（青浦縣城，青4）和嘉定（嘉17）四個州、縣城薈萃其間。由此向外，本區仍有上海縣城（上91），只是位置稍偏，地處吳淞江下游，相對孤立於東南角。一五五〇年前後，全部的鹽鐵塘主幹區分屬六個縣管轄，除最北的常熟縣城（常79）因周圍多湖泊，將之歸為湖群低地區外，其餘五個縣城竟然都聚集在劉河與吳淞江中下游這一隅之地。姑不論州縣治所在政治以外的社會經濟作用，純就地方行政控制的強度而言，該區就頗具獨特性了。

表三：明中葉（1550年止）位於劉河與吳淞江中下游區的市鎮

	1	2	3	4	5	6	7
圖一市鎮 代號	上12	上27	上91	太31	太36	太38	太39
市鎮名稱	江灣鎮 (高境廟)	真如鎮	上海縣城	劉河鎮	太倉縣城	諸涇市 (官塘村)	西碼頭市 (西郊鎮)
	8	9	10	11	12	13	14
圖一市鎮 代號	太40	太42	太43	青2	青4	青7	崑6
市鎮名稱	南碼頭市 (南郊鎮)	葛隆鎮 (吳公市)	蓬閤鎮	趙屯鎮 (趙中橋)	青龍鎮 (青村鎮) (舊青浦)	杜村	崑山縣城 (玉山鎮)
	15	16	17	18	19	20	21
圖一市鎮 代號	崑7	崑14	崑15	崑20	崑21	嘉7	嘉9
市鎮名稱	兵墟鎮 (半步涇)	陸家浜市 (綠葭濱)	泗橋鎮 (瓦浦橋)	千墩 (茜墩) (千燈)	石浦鎮	婁塘鎮	瓦浦 (央家村)
	22	23	24	25	26	27	28
圖一市鎮 代號	嘉16	嘉17	嘉19	嘉31	嘉33	嘉34	嘉36
市鎮名稱	新涇鎮 (新涇橋) (澄橋)	練祁市 (嘉定縣城)	錢門塘市	安亭鎮	南翔鎮	黃渡鎮	封家濱市
	29	30	31	32	33	34	35
圖一市鎮 代號	嘉40	嘉43	寶18	寶9	寶11	寶14	寶24
市鎮名稱	紀王廟 (紀王鎮)	白鶴江 (白鶴港鎮)	廣福鎮	羅店鎮	月浦鎮	寶山縣城	大場鎮

在上述五個州縣城中，太倉州城與崑山縣城緊沿劉河兩岸而立。由崑山縣城向西，循至和塘可直抵蘇州城下（吳39）。換言之，在同一條河上實際有三個府州縣城。劉河尾閘又有劉河鎮（太31），是清嘉道年間上海興起以前，蘇南地區對外最重要的一個海洋貿易重鎮。由這些城鎮的分佈，可見傳統沿劉河地區的政經色彩，可說是異常的濃厚。這可藉太倉州城本身和劉河鎮早期崛起的背景以及在社會經濟方面所起的作用，做進一步的說明。

明代以前本無太倉州的設置，境內統歸崑山縣管轄。元延佑年間（1314-1323），崑山縣治一度東遷到日後的太倉州城址，但到至正（1341-1367）中期復移回舊址。<sup>56</sup> 明弘治十年（1497），都御史朱瑄和御史劉廷瓚採鄉人浙江布政使右參政陸容的建議，疏請割崑山縣新安、惠安、湖川三鄉以及常熟縣雙鳳鄉和嘉定縣樂智、循義二鄉，合建太倉州，領崇明縣，隸蘇州府。<sup>57</sup> 雖然州的設置頗晚，太倉州城原址早在元初至元十九年（1282），已因朱清、張瑄海運南漕自崇明徙居當地，「營卜第宅、丘墟遂成園闢，港汊悉為江河，漕運萬艘，行商千舶，集如林木，高樓大宅，琳宮梵宇，列若鱗次，實為東南之富域矣！」<sup>58</sup> 另有一說稱太倉城「開海運，通直沽，舟師貨殖，通諸蠻夷，遂成萬家之邑，……四方謂之天下第一碼頭。」<sup>59</sup> 傳統的描述未免過於誇張，但就鄰近的崑山、嘉定縣城而言，歷來方志從未有過類似的說法，太倉城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記錄，或許是有一定的史實基礎。

當太倉州城於元初大盛之時，其地理位置所在即使衡以南宋時的海岸線，也去海尚遠，<sup>60</sup> 當地竟然可以發展成一個航運大碼頭，這應該與蘇南地區發展的動向有關。這又可藉劉河鎮與太倉州城在航運地位上的消長之勢，進一步說明之。<sup>61</sup> 太倉城址一直到北宋還只是一個「田疇半闢，居民尚不滿百」的村落。<sup>62</sup> 其下游的劉河兩岸更是「萑蒲葦蕩，人跡寥寥」。劉河河口地帶的劉河鎮，南宋金氏與

<sup>56</sup> 至正《崑山郡志》（至正四年〔1344〕），頁2604。

<sup>57</sup> 民國《太倉州志》，頁43-44。

<sup>58</sup> 陳仲，〈太倉事蹟序〉，收入崇禎《太倉州志》（崇禎十五年〔1642〕），舊序，1a。

<sup>59</sup> 陳仲，〈太倉事蹟序〉，收入崇禎《太倉州志》，舊序，2a。

<sup>60</sup> 參見〈市鎮分佈與地域的開發——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圖一及其相關討論。

<sup>61</sup> 《劉河鎮記略》（道光三年〔1823〕），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9集，頁295。

<sup>62</sup> 民國《太倉州志》，頁2097-2102。

太原王氏隨宋室南來，隱居海濱，躬耕爲業，當地始初見人煙。<sup>63</sup> 元初海運南漕時，糧艘出太倉而不出劉河鎮，原因之一是終元之世，吳淞江水經新洋港、鹽鐵港，以及穿過嘉定縣城的幾條河道皆暢流入劉河，<sup>64</sup> 當時由海口抵太倉州城的劉河江面尚甚爲遼闊，這是其在元初得以容得下「漕運萬艘」的一個先決條件；其次，當時由蘇州地區沿劉河向東拓展，可能尚止以太倉州一帶。明清史料雖然指稱劉河鎮於南宋以後「生齒日繁，豪強之家得以占沙據海，地旺財生。劉河北岸居民日增月盛，而南岸沙灘遙遙數里，故洋舸戰艦得以停泊，漸通商賈，遂成海舶碼頭。」<sup>65</sup> 這應該是後來歷經宋元長期發展的一個結果。南宋劉河鎮所代表的劉河尾閘地區雖漸有人煙出現，但當地的開發不可能和偏上游的太倉州治一帶相比。至於明代以來的變化，則反映在劉河鎮代太倉城而起的這一大勢上。

明成祖時鄭和下西洋首航出自劉河鎮而非太倉城。自此「外國貢使絡繹而來，而番商洋賈慕劉河口之名，帆檣林立，於是議設市舶提舉司於太倉，專管通商收稅之事，而劉河之財賦，遂甲於天下矣」。<sup>66</sup> 當時的劉河鎮轉被稱爲「天下第一碼頭」。<sup>67</sup> 此上去元初不過百年，劉河鎮竟代太倉州城發展成爲蘇南地區第一線上的海貿重地。太倉州治退居後方，乃變成主管收稅的行政中樞。另一方面，太倉州治當時的軍事色彩也很濃厚。一直到設州前夕，太倉城實際上都是由太倉與鎮海兩軍衛共治。當時「衛所內外軍民雜處，軍多刁蠻，欺凌民戶。」<sup>68</sup> 對照元代，商業活動在太倉州城與劉河鎮兩地之間如此消長，也適足以反映蘇南地區不斷向海岸地帶開發的大勢。清代人說「劉河鎮發源不自劉河鎮始也。未有劉河鎮，先有劉河城。未有劉河城，先有太倉城。未有太倉城，先有太倉（漕倉）」，<sup>69</sup> 正是這樣一個變化的最佳寫照。

太倉地區未析出爲州以前，全部歸崑山縣管轄，而崑山設治於唐天寶十年（751）。南宋理宗時代（1241-1252）所修的《玉峰志》中，尚稱崑山「素號澤

<sup>63</sup> 《劉河鎮記略》，頁295, 403。

<sup>64</sup> 《劉河鎮記略》，頁296。

<sup>65</sup> 《劉河鎮記略》，頁295。

<sup>66</sup> 《劉河鎮記略》，頁367。

<sup>67</sup> 《劉河鎮記略》，頁296。

<sup>68</sup> 民國《太倉州志》，頁43-44。

<sup>69</sup> 《劉河鎮記略》，頁291。



國，襟江帶湖，朝宗於海，而潮汐又往來於旦晝」。<sup>70</sup> 明代析出太倉以後的崑山縣地處太倉州上游，從境內市鎮分佈的情形來看，地愈近蘇松地區的湖群沼澤帶，則愈形疏闊寂寥。到明中葉，包括縣城在內，崑山全境也不過只有七個市鎮而已。其中四個皆沿吳淞江侷促於東南一角；兩個鄰近太倉邊境；崑山縣治則孤懸於縣內正中地區。

商業機能方面，明中葉的崑山縣城對於周邊地區而言，正如時人所述：「若夫九鄉之民，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所需菽粟布帛雞豚薪芻果蔬茶鹽之類，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咸趨橋而爲市焉。」<sup>71</sup> 這裡所說的「橋」乃是縣治西北附郭的半山橋。從地圖上看，此言誠屬不虛。在一個近代工商業開始發展以前的傳統社會裡，市鎮通常會隨商業活動之漸趨熱絡而日益增多，其等級結構亦因之而生，但較不明顯。較顯著可見的，則是各市鎮的市場圈會相對日益縮小。以崑山縣治當時市場圈涵蓋範圍如此之廣，可想見其周遭的發展應該還相當落後。如結合下游太倉境內的情形一體來看，這種情況其實可以推諸於整個劉河流域（此處以及以下所提流域之說並無嚴格的界定，如指集水區或沿河幾公里範圍內等，只是概略取沿河較近之地而言）。

由圖一、二可見，屬劉河上游的至和塘東出蘇州城（吳39）後，一直延伸到崑山縣城，在這沿河六十餘公里兩岸方圓達數百公里以上的範圍內，僅有王墓市（吳41）一個一級的小鎮。再往下，太倉州境內的劉河兩岸暨鄰近鹽鐵塘一帶，除太倉州治與劉河兩個大鎮市外，僅有五個鎮，其重要性也都微不足道；南碼頭市（太40）緊鄰劉河，原是元、明初行海運漕糧時的糧倉所在，到明中葉和西碼頭市（太39）同發展成州治附郭的衛星小市；葛隆鎮（太42）則早於成化年間（1465-1487）因鄰近嘉定知縣吳克明導民於此而成市，<sup>72</sup> 但直到民國期間都還僅止於一級小鎮的規模；諸涇市（太38）於十六世紀初成市，日後的發展亦與葛隆鎮類似；蓬閔鎮（太43）可能規模較大，但最多恐怕也不過是一個二級的鎮而已。換言之，元明初以來一直到明中葉止，整個劉河流域的開發儘管由內陸逐漸向沿海地區延伸，劉河鎮在蘇州地區的海貿吞吐方面也取得要津的地位，然而隨劉河航運本身商業積漸所至而興的大鎮市，卻只有太倉州城與劉河鎮，即使再加

<sup>70</sup> 淳祐《玉峰志》（宋淳祐年間），頁380。

<sup>71</sup> 鄭文康，〈重修半山橋記〉，見光緒《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光緒六年〔1880〕），頁791-792。

<sup>72</sup> 弘治《太倉州志》，1：13a-14a；萬曆《嘉定縣志》，頁126-127。

上崑山縣城，也不過是在一片帶狀地區各相隔約十六公里的地方，形成三個較大的商業聚落罷了。

截至一五五〇年止，劉河以南與劉河同源的吳淞江流域，另有兩個層級最高的鎮市，分別是位於鹽鐵塘與吳淞江交會處的青浦縣城（青龍鎮，青4），以及在吳淞江注入黃浦江處的上海縣城。如果再加上上游的蘇州城，則和劉河一樣，地處吳淞江沿岸也有三個府縣城。就政治中心所衍生的社會經濟意義而言，其在蘇南地區的特殊性也不言而喻。

上海之獨立成縣，始於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這之前，明正德年間的《松江府志》曾有一則記載說：「上海縣（城）在府東北九十里，本華亭縣舊地。後以人煙浩穰，海舶輻輳，遂成大市。宋於其地立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曰上海鎮。」又說其地「實華亭東北一巨鎮也」。<sup>73</sup> 如此形容上海鎮的發展，時間上卻是含糊籠統。其實根據今人考證，上海在北宋時僅設酒務，直到南宋後期方可能增設市舶分司、巡檢司和商稅務。至於當時曾否正式設鎮，則尚有待進一步的考證。<sup>74</sup> 不過，至元二十九年因華亭地大民眾難理，乃從知府僕散翰文之請，析高昌、長人、北亭、海隅和新江五鄉凡二十六保立縣，設治於上海。<sup>75</sup> 此時正值元初，則前不久的南宋末，上海城當不致於還停留在一個小鄉村的階段才是。其實元代已成為治所後的上海縣城也無任何相關記載。由於史料匱乏，事實真相如何，是無從深究的。

相對於上海縣城早期歷史的隱晦不明，地偏內陸的青浦縣治所在，其早期繁華，則是顯而易見的事實。青浦雖遲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方由華亭和上海二縣析出，但初期縣治所在的青龍鎮（青4），卻於宋代即已赫赫有名。其地於唐代中期出現聚落。宋時吳淞江流至青龍鎮附近以後，江面逐漸變闊，呈一喇叭口狀，海潮自吳淞江口至此形成湧潮；青龍鎮以青龍江和吳淞江相通，故當時人有「太湖之水由青龍江入海」之說。由於優越的海船寄泊條件，再加上魚米之鄉的蘇、常、秀、湖諸州為其廣闊的腹裏，青龍鎮乃發展成上海地區最早的對外貿易港。十世紀末的北宋中期至十二世紀三〇年代的南宋初年，是貿易鼎盛時期。元初由於吳淞江與青龍江相繼淤淺，青龍鎮雖規模尚在，但已無復海商往來。蘇南

<sup>73</sup> 正德《松江府志》（正德七年〔1512〕），頁28, 417。

<sup>74</sup> 王曾瑜，〈宋代的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3.1：74。

<sup>75</sup> 正德《松江府志》，頁417。

通海商舶曾一度移到下游黃渡鎮東不及半里的泊船灣停靠。<sup>76</sup> 但陸續代之而起的，則是上述的太倉州治、劉河鎮，以及吳淞江下游的上海港。<sup>77</sup>

入明以後，「青龍地方，……今皆荒廢，田地蕪穢。」<sup>78</sup> 然而嘉靖二十一年青浦設縣時，仍以青龍鎮為縣治。不過，設縣不久也就是嘉靖三十二年，青浦旋被裁撤。萬曆元年（1573）青浦復設縣，縣治則改為偏南淀浦河畔市場交易遠較繁盛的唐行鎮（青26），這也就是一直延續到今天的青浦縣城所在。對照這些變化，青龍鎮前被定為縣治，實元初中衰以來的迴光返照罷了。由於屬縣治所在，本研究到一五五〇年止也就是明中葉這一期，把青龍鎮列為市鎮四階層之首，然而根據其後的發展研判，青龍鎮當時最多恐怕也不過是一個略具商業機能的小集鎮罷了。其之一度能成為縣的政治中心，或許純粹是歷史的餘蔭使然吧！

青浦設治於青龍鎮的同時，沿吳淞江南北兩側另有千墩（崑20）、安亭（嘉31）、黃渡（嘉34）、南翔（嘉33）、大場（寶24）和江灣（上12）六個可能達到三級規模的鎮。當時其所具有的商業機能，應該是作為縣行政中心的青龍鎮所不能及的。千墩地較偏內陸，宋室南渡以後開始形成聚落。以後食口日繁，民居鱗接，始有市場出現於鎮的東銜。相傳明太祖曾建申明亭於鎮以申鄉約，又復設市於當地的淞南第一橋以便行旅。日後根據倭寇劫掠該地曾深受其害這一旁證來看，千墩一直到明中晚應該始終維持著一定的規模，<sup>79</sup> 而且還很可能是崑山境內縣城以外最重要的一個市鎮。<sup>80</sup>

明中葉由千墩沿吳淞江東下，首先遇見的大鎮應該就是地處崑山與嘉定交界的安亭。有關其早期史料，目前可見者極少。只知道十五世紀末，當地早已商業為重。又自明初以來當地即設有稅課子局。<sup>81</sup> 本文之所以將明中葉時的安亭列入

<sup>76</sup> 《黃渡鎮志》（咸豐元年〔1851〕），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3集，頁741。

<sup>77</sup> 有關青龍鎮的歷史可參見：鄒逸麟，〈上海地區最早的對外貿易港——青龍鎮〉，《中華文史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總13（1980.1）：119-129；譙樞銘，〈青龍鎮的盛衰與上海的興起〉，《社會科學》1980.6：109-112, 93。

<sup>78</sup> 明·徐獻忠，《徐長谷文集》卷一〈答袁郡守論水利〉，收入《明經世文編》（明·陳子龍等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二六八，頁2836。

<sup>79</sup> 《淞南志》（康熙五十四年〔1715〕），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4集，頁748。

<sup>80</sup> 關於這一點，日後探討蘇南1551-1861年這段期間市鎮的發展，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sup>81</sup> 正德《姑蘇志》，18：12b-13a；《安亭志》（嘉慶十三年〔1808〕），收入《中國地方

三級鎮市之林，不過是根據後來的情況推估而定的。安亭再東，黃渡與南翔二鎮到明中葉時的情況就較為明確。二者皆自宋元以來即已成鎮。其繁盛的程度在嘉定境內也數一數二。黃渡昔有「小杭州」之稱，元明之際雖迭遭戰火，而清人引明正德年間的《練川圖記》則稱黃渡在嘉定「市五鎮七」中名列第二。一五五〇年前後，當地「商販復鼎盛」。<sup>82</sup> 這反映黃渡可能經歷過一番浮沉，但商業機能仍然不減。關於南翔鎮經濟繁榮的程度，在明初時就已居嘉定全縣各市鎮之首。<sup>83</sup> 萬曆三十三年（1605）修的《嘉定縣志》說：南翔「往多徽商僑寓，百貨填集，甲於諸鎮。」<sup>84</sup> 這一個「往」字到底可上溯至何時實未可知，不過，其地宋元即已成鎮，規模又在嘉定境內數一數二，以理推之，回溯到明中葉這一階段，作為一個三級的大鎮應該是無庸置疑的。

大場鎮在一般明清與民國時期的地方志中，都說其地在宋代曾置大鹽場，鎮因而得名。不過，唐代海岸線已在其東，宋代則更向外移，其地當時何以會有大鹽場之設目前殊難理解。在十七世紀初也就是明萬曆中後期，鎮上具體的情況並無從得知，但範圍大小則有「東西三里」的一則記錄。<sup>85</sup> 比照同期其它一些大鎮的規模來看，向前推數十年到一五五〇年前後，其側身於三級鎮之列，可能性應該很高。江灣鎮又在大場東方七公里處。其歷史淵源頗久，傳說宋代曾在此設忠節水軍寨，紹興（1131-1162）年間韓世忠也曾屯兵於此，明初以來又設巡檢司，可見該地早期為河、海防要地。<sup>86</sup> 明代有關鎮內部情形，通說「迄明嘉靖之季毀於倭寇，市肆蕩然」。<sup>87</sup> 此蕩然之前的市肆規模究竟如何，並未可知。不過亂後復舊，到十七世紀初，也就是萬曆中晚期時，鎮「東西三里，南北一里」，<sup>88</sup> 據此記載，當時已是一個三級鎮應無可疑。向前推數十年，市肆蕩然前的規模或與之相去不遠，算是一個三級的鎮吧。

---

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3集，頁340。

<sup>82</sup> 光緒《青浦縣志》（光緒五年〔1879〕），2：6a-b；《黃渡鎮志》，頁752；《嘉定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93。

<sup>83</sup> 《嘉定縣志》（1992），頁80。

<sup>84</sup> 萬曆《嘉定縣志》，頁124-125。

<sup>85</sup> 萬曆《嘉定縣志》，頁125-126。

<sup>86</sup> 光緒《寶山縣志》（光緒八年〔1882〕），頁137。

<sup>87</sup> 《江灣里志》（民國十三年〔1924〕），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4集，頁615。

<sup>88</sup> 萬曆《嘉定縣志》，頁125-126。

劉河與吳淞江中下游區內所有上述各縣城及三級鎮，再加上次一級的陸家浜市（崑14）、泗橋（崑15）、石浦（崑21）、白鶴江（嘉43）和真如鎮（上27），則元末明初以來，雖然有關太倉州城與劉河鎮的史料，都反映劉河航路在蘇州地區通海貿易的重要性，應較吳淞江為高，但無論就市鎮數量或規模而言，吳淞江兩岸城鎮化的發展，卻都明顯要勝過劉河流域一籌。原因何在？青龍鎮原為蘇南最早對外通商的港口，其周圍地區的開發理應早於劉河流域。日後青龍鎮雖然為太倉州城以及劉河鎮所先後取代，但吳淞江流域的開發活動應該並不受影響。既然拓殖期起源較早較長，當地市鎮可能因此較多也較大。

劉河與吳淞江之間還有練祁塘與之平行，嘉定縣城（嘉17）恰好就位於溝通這三河管道——南北橫瀝的中間位置。嘉定置縣始於南宋嘉定十年（1217），而縣城所在練祁市相傳更早在梁天監年間（502-519），就已環當時的護國寺而成集市。<sup>89</sup> 如果就唐以前蘇南地區海岸線的位置來看，練祁市當時去海不遠，應該就是蘇南此區面海發展的極致。唐宋以來泥沙淤漲，海岸線不斷向外延伸，嘉定縣城以東也漸有人煙出現。隨人群所聚，元至元年間（1335-1340），首先有里人羅昇在嘉定縣城東向九公里處的羅店（寶9）創市。兩百多年以後，萬曆《嘉定縣志》才有資料說：羅店「比閭殷富」、「徽商湊集，貿易之盛幾類南翔矣。」<sup>90</sup> 雖然該文所指的確切年代無從得知，但半世紀之前的一五五〇年前後的情況，應該不會相差太遠。

既然提到羅店後來「貿易之盛幾類南翔」，而羅店成鎮的時間要遠後於南翔，特以此二鎮所處的地理位置與興起的時間進一步觀之：南翔所在的吳淞江流域原本開發就較早，南翔可謂很早就順勢而興。至於羅店所在則屬後來持續淤漲而成，羅店後興本乃理所當然。然而後者至少到明中葉已可與前者比肩，這一發展或許也正可以體現嘉定縣城以東地區，自宋迄明中葉止持續的拓墾。

明中葉，羅店以東還有月浦（寶11）和寶山城（寶14）兩個可能達到二級規模的鎮市。正式成鎮前的月浦饒富地方警備的色彩。明初當地曾設有顧涇巡檢司。萬曆年間則有「近頗荒涼」的說法，<sup>91</sup> 這顯然與同時的羅店鎮不可相比。寶山則較月浦更靠近海邊，明嘉靖十六年（1537）在該地初建方形城垣。<sup>92</sup> 當時可

<sup>89</sup> 《嘉定縣志》（1992），頁79。

<sup>90</sup> 萬曆《嘉定縣志》，頁124-125。

<sup>91</sup> 萬曆《嘉定縣志》，頁125-126。

<sup>92</sup> 李香芳，《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典·上海市》（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頁153。

能純粹因衛所營兵的聚集，才會帶動一些商業性的活動。捨此要素，就自然的經濟發展而言，月浦和寶山周圍近海之地，當時應該還相當荒蕪。

回到嘉定境內，明中葉嘉定縣治西北七公里處還有一個三級的婁塘鎮（嘉7）值得注意。其地西北出嘉定縣城六公里，在北橫瀝旁。明永樂（1403-1424）年間里人王璿在此創市，這代表周遭地區在當時已有所發展。二百餘年後到萬曆年間，鎮已經是「其地四面方廣各三里」，<sup>93</sup> 與當時羅店鎮的幅員相當。<sup>94</sup> 去此不久的一五五〇年前後，鎮顯然已具有類似的規模。清乾隆時人曾泛指婁塘是明清嘉定縣北境最大的一個市鎮。<sup>95</sup> 其地介於劉河與練祁塘兩大幹流的中間地帶，興起時間又較鄰近位於劉河以及練祁塘上的劉河鎮和羅店鎮都晚，這或許可以反映蘇南長期以來由內陸向海岸地區的拓墾，先沿主幹河道而後向兩側擴展。

婁塘鎮以外，嘉定西北部還有瓦浦（嘉9）和錢門塘市（嘉19）兩個較小的鎮。前者存在的時間並不長，一五五〇年以後就消失了，地方志中也僅載其名而已，地位應無足輕重。後者的情況則非常特殊，在元明以前本是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大鎮。乾隆時人說：「自南宋初（嘉定）立縣，設倉儲於此，運艘自徐公浦南達吳淞江，故人居稠密，商賈貿易往來交通，東西連接四五里。市跨今姚家宅，過之士庶殷實，儼然小都會，幾與南翔類近似。」<sup>96</sup> 然而「自明以來，人口衰少，特鄉之小者耳」。<sup>97</sup> 其實不僅止於乾隆年間，就目前所見，從明中葉起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錢門塘市的規模從來也未曾見擴大過。

錢門塘市作為蘇南早期開發中地區一個糧食聚集與中轉的要地，透過原本「此水深通」的徐公浦（俗所謂小錢門塘）南與吳淞江相通，<sup>98</sup> 下游大鎮先遇前已提過的安亭（嘉31），接著就是青龍鎮（青4）。兩地及周圍的官民食當時對之可能都有所仰仗。即由相關的地理位置來看，錢門塘市與青龍鎮在宋代可以同

<sup>93</sup> 萬曆《嘉定縣志》，頁124-125，此處說三里，但清以後各志都說二里，此三里之說或許有誤。

<sup>94</sup> 萬曆《嘉定縣志》，頁124-125。

<sup>95</sup> 乾隆《嘉定縣志》（乾隆七年〔1742〕），1：19b-20a；李香芳，《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典·上海市》，頁175。

<sup>96</sup> 《望仙橋鄉志》（應修於道光以後，但無確切年代），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3集，頁789-790。

<sup>97</sup> 《錢門塘鄉志》（民國元年〔1912〕），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4集，頁6。

<sup>98</sup> 光緒《嘉定縣志》（光緒七年〔1881〕），1：20a-21a。

時興起，應該也並非純屬偶然。由此又可以看出蘇南地區最早以吳淞江流域爲主的開發動向。宋以後，青龍鎮首先敗於青龍江與吳淞江的相繼淤塞，錢門塘市隨後又因徐公浦的淤淺也日漸凋零。<sup>99</sup> 蘇南水系自然環境變化影響及於聚落興衰者，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 （四）淀浦河流域

淀浦河又在吳淞江之南，東西向恰好流經吳淞江與黃浦江北流前的中央地帶。截至一五五〇年止，以其爲中心的淀浦河流域，總共出現十七個鎮。其分佈很明顯有朝淀浦河兩岸集中的趨向，特別是較具規模的二、三級鎮，幾乎都緊沿淀浦河分佈或與之頗爲接近。至於一些離河較遠的鎮，則都屬規模很小的一級鎮。如果說鹽鐵塘主幹區範圍內的上述三區，無論就地勢或河川走向而言，都屬於蘇州地區面向海洋拓展的前沿地帶，則淀浦河流域乃具有蘇州和松江府之間走廊地帶的特色。由於長年居間爲兩地商人往來的通道，淀浦河西向過淀山湖到對岸，竟形成一名爲商楊（青43）的鎮。雖然該鎮初見於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的《青浦縣志》，後來規模始終不大，但位居商人往來蘇、松居停適中之地，兩地商人至夕以此爲下榻之地，鎮原名雙塔，日久竟諧稱商楊。此外鎮上人家又多駕船爲生，主要可能就是從事蘇、松兩地商貨轉運接駁的工作。<sup>100</sup>

明中葉，由商楊向東越過淀山湖，起岸後，循淀浦河到黃浦江爲止，兩岸規模較大，可達二、三級的市鎮共有七個。這些由西向東，首遇朱家角鎮（青45）。目前一般多認爲當地於明萬曆年間始成鎮。<sup>101</sup> 不過，首次出現於萬曆二十五年的《青浦縣志》時，朱家角鎮就已是「商賈湊聚，貿易花布，今爲巨鎮」。<sup>102</sup> 之前，朱家角鎮的情況，無論就青浦析縣以前所屬的華亭或者上海縣的縣志中，都了無蹤跡可尋。朱家角在十六世紀末已被稱爲「巨鎮」，除非短期間驟然大興，回溯幾十年到一五五〇年前後，說該鎮至少已具有二級規模，應該是合理的推論。

<sup>99</sup> 《望仙橋鄉志》，頁789-790。

<sup>100</sup> 萬曆《青浦縣志》（萬曆二十五年〔1597〕），2：5a-b。

<sup>101</sup> 李香芳，《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典·上海市》，頁218-219；《青浦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85。

<sup>102</sup> 萬曆《青浦縣志》，2：4a-5a。



表四：明中葉（1550年止）位於淀浦河流域的市鎮

	1	2	3	4	5	6	7
圖一市鎮代號	上59	上63	上72	松3	松4	松10	青15
市鎮名稱	虹橋	漕河涇	烏泥涇鎮 (鄭家橋)	泗涇鎮	莘莊鎮	沙岡鎮 (沙港巷)	蟠龍鎮
	8	9	10	11	12	13	14
圖一市鎮代號	青16	青26	青27	青32	青35	青37	青41
市鎮名稱	楊林市 (楊涇巷)	唐行鎮 (青浦縣城)	崧宅市 (崧澤)	七寶鎮	泰來橋市 (橫港)	鳳凰山鎮	廣富林市
	15	16	17				
圖一市鎮代號	青43	青45	嘉42				
市鎮名稱	商榻 (商塔) (雙塔)	朱家角鎮 (珠街閣) (珠里)	諸翟巷 (諸翟鎮) (紫隄)				

當朱家角鎮確實的狀況尚渾沌不明時，更偏東的唐行鎮（青26）至少在十六世紀初期，就已明白成為蘇州與松江地區之間商業往來的要地，所謂「控澱湖（淀山湖），為吳門要衝」，有新涇稅課局之設。拔本溯源，元代有大姓唐氏居此，商販竹木，因成中市。<sup>103</sup> 嘉靖二十一年（1542）青浦初設縣時，原以縣境偏北已衰微的青龍鎮為縣治。嘉靖三十二年（1553）廢縣。萬曆元年（1573）復設縣，縣治改設唐行鎮。青浦縣的政治與經濟中心正式合而為一，直到今天。

明中葉整個淀浦河流域中，市鎮規模與唐行差堪比擬的，唯有地近上海縣境位於橫瀝港邊的七寶鎮（青32）。其地有浦匯塘與淀浦河相通，是蘇、松兩府城通上海的要地，乃商賈所必由。其地於一五〇〇年代初期亦設有稅課局。<sup>104</sup> 鎮

<sup>103</sup> 正德《松江府志》，頁343-344。

<sup>104</sup> 正德《松江府志》，頁336-337。

區原被浦匯塘分割成南北兩半，當時方建浦匯塘橋，連接南北大街。<sup>105</sup> 此可見七寶鎮當時仍是方興未艾。

一五〇〇年代初，唐行鎮正盛，東行去五公里半處有一小鎮名崧宅市（青27）。其地在宋代原有一段輝煌的歷史。原來當青龍鎮貿易鼎盛時，崧宅與章廟（青9）（疑為章堰，見未來另文討論1551-1722年期間市鎮附圖）、高塔（不知所在）和重固（青12）（未來見1551-1722年期間市鎮附圖）同是貴胄巨室的聚居所在。四鎮當時並稱「視親臣巨室鄰燭輝赫」。這說明宋室南遷時有一些王公巨室移居其地，因而帶來一番繁榮的景象。然而這畢竟只是一個短暫的過渡而已。曾幾何時，這些鎮多趨蕭條，唯獨崧宅至少到一五〇〇年代初時，尚且是「市廛日闢，商販交通爾」。<sup>106</sup>

淀浦河流域其他值得一提的市鎮還有泗涇（松3）、莘莊（松4）和烏泥涇鎮（上72）三個。據其前後情況研判，一五五〇年以前，這三個鎮充其量都不過達到二級鎮的規模而已。不過，日後各自發展，出現絕大差異。泗涇市位於松江、上海兩地往來的交通要衝。由松江府城到上海縣城，先順通波塘到泗涇鎮，然後再沿淀浦塘經七寶鎮。泗涇鎮興起於元中葉，明中葉的情況不明。明末則是「今民居聚，商賈集」，為今日松江縣東北部一個較大的鎮。<sup>107</sup> 估量到一五五〇年前後，已算得上是一個二級鎮。莘莊據傳在南宋開始成聚落，元成集市，明成鎮。<sup>108</sup> 不過，一直到明末清初，史志都說「本瘠土也」，但卻有「民居數千指」，很可能指莘莊鎮及其四鄉而言。康熙修《松江府志》者嘆說：其「居然稱鎮」，<sup>109</sup> 似乎莘莊在時人的心目中仍不具份量。然而一九六〇年代以後，上海縣治竟移設於其地，顯示莘莊在明清時蓬勃發展則未必，但至少長期穩定存在。回首明中葉，其地可能與泗涇的規模相當。

烏泥涇鎮與泗涇、莘莊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該鎮位於淀浦河與黃浦江的會合處。「宋季張百五居之，富埒侯伯。元至元間張瑄以海運隆顯，治第其中。後

<sup>105</sup> 李香芳，《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典·上海市》，頁168。

<sup>106</sup> 正德《松江府志》，頁343-344。

<sup>107</sup> 崇禎《松江府志》（崇禎四年〔1631〕），3：1a-7a；李香芳，《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典·上海市》，頁207。

<sup>108</sup> 李香芳，《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典·上海市》，頁168。

<sup>109</sup> 崇禎《松江府志》，3：1a-7a；康熙《松江府志》（康熙二年〔1663〕），17：29a-30b。

又有張有錢居之，邑之倉廩具貯於茲，以故人民盛於他鎮」。<sup>110</sup> 元初黃道婆由崖州引入棉紡織器具與技術，進而帶動整個明清江南地區的棉紡織業，此起於烏泥涇鎮，以當時情況而言，應非偶然。前曾提及，張瑄於元初在太倉州城督辦江南海運漕糧事，上海地區徵收的漕糧當時即先聚於烏泥涇鎮。以其港深，漕船出入方便，避風又較上海縣城為佳之故。<sup>111</sup> 此外，烏泥涇鎮與浦東的三林塘（上71）和周浦鎮（南34）隔江相望，居上海縣城或松江府城通浦東地區的要道，坐享地利之便，可能也是烏泥涇鎮早期能成為一個較重要市鎮的原因之一。然而，明弘治年間（1488-1505），烏泥涇地區的河道開始日漸淤塞，連帶導致烏泥涇鎮本身的商業活動日漸衰歇。儘管如此，鎮稍後還保有稅課局的設置。<sup>112</sup> 倭寇之亂時，「倭賊繇三林、周浦渡黃浦而西，即犯（上海）縣治。若犯（松江）府境，必繇烏泥涇」，<sup>113</sup> 鎮乃益敗。一九八〇年代治上海沿革地理的老學者祝鵬親臨其地考察後說：「現在所見古烏泥涇鎮的街巷中心區域，是一片約二里見方的大平田，不見一棵樹。」<sup>114</sup> 前後對照，真可謂滄海桑田了！

## 小結

綜合明中葉鹽鐵塘流域四個小區內既存各市鎮的起源、分佈與規模來看，最北邊長江口南岸沙洲區的開發顯得最為落後，不過境內市鎮分佈之稀疏，反襯出福山鎮（常25）的發展一枝獨秀，格外醒目。進一步以福山結合偏南大鎮梅李（常56）和沙頭（太20）一併觀察，發現長江口南岸沙洲區與梅李、楊林塘地區聯外的商業活動，主要是指向江北通州、泰州、崇明島以及江南的蘇州和湖州兩大區域，上述幾個鎮實居中扮演媒介的角色。至於較具規模的老徐市（常76）則是源於明代的拓墾。沙頭也因元明以來一些大族的陸續遷入，而日具規模。支塘鎮（常99）主要的經濟活動不明，但極可能也和其它諸多小鎮一樣，純肇因於周圍地區的墾殖，隨人煙所聚而興。至於墾殖的先決條件，無疑就是新物種——棉

<sup>110</sup> 嘉慶《松江府志》（嘉慶二十二年〔1817〕），2：30a。

<sup>111</sup> 祝鵬，《上海市沿革地理》（上海：學林出版社，1989），頁318。

<sup>112</sup> 正德《松江府志》，頁341-342。

<sup>113</sup>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卷二四，〈江南六·上海縣·烏泥涇鎮〉，頁195。

<sup>114</sup> 祝鵬，《上海市沿革地理》，頁319。

花於宋元的引進。岡身以東的土地邊際效益低，原本無可利用，植棉有利於拓墾，連帶促成棉手工業和商業興起，進一步帶動地方的繁榮。這一基本原理探討者已多，此處不再贅述。<sup>115</sup>

繼續從市鎮聯外貿易活動的角度觀之，劉河與吳淞江中下游區和長江口南岸沙洲區、梅李與楊林塘區最大之不同，就是本區為傳統蘇州與湖州地區對外遠洋貿易的前哨地帶。最早蘇、湖地區的海洋貿易主要集中在吳淞江流域的青龍鎮（青4）。後來轉移到太倉州城（太36）。其地甚至因貿遷海外而博得「六國碼頭」的稱號。這六國指「大小琉球、日本、安南、暹羅和高麗」諸外洋地區。<sup>116</sup> 沿岸貿易方面，由於太倉城內「番漢間處，閩廣雜居」，<sup>117</sup> 這反映蘇南地區透過太倉與閩廣地區也有商業的往來。而早期太倉所扮演的這種角色，日後則又全被下游的劉河鎮（太31）所取代。

當吳淞地區的青龍鎮式微以後，下游的上海鎮（上91）代之而起。但截至一五五〇年代為止，其地位尚遠不及劉河鎮。儘管海貿重心已轉移，吳淞江流域及其鄰近的練祁塘地區，卻始終聚集著較多且商業地位亦較凸顯的市鎮。劉河流域的市鎮數目則並未因劉河商貿比重之提升而顯著增加。這反映蘇、湖地區海外貿易路線與港口的長期變遷，並不影響吳淞江地區舊有市鎮的持續發展。這是否可單純歸因於青龍鎮崛起較早，帶動周圍地區先於劉河流域持續與穩定的開發？抑或早期經太倉州城與劉河港的外貿活動，對於促進蘇南本地經濟發展的作用本就相當有限？如果後者屬實，則截至一五五〇年止，海外貿易活動對於促進蘇南本地的發展，似乎還遠不及內陸向海岸地區拓展的動力來得重要。

最後，淀浦河流域就其地勢相對鹽鐵塘其它三區而言，最大的不同就是通江（黃浦）而不臨海。迄一五五〇年止，境內市鎮數量雖不多，但大鎮如唐行（青26）、七寶（青32）等，至少在商業活動方面，都反映出位居蘇州與松江府往來孔道的性質。兩鎮的興起或許也反映蘇州東向朝松江地區逐漸發展的大勢。而由蘇州地區循淀浦河東行過黃浦江，最終將抵達松江府的南部與東部，也就是如下要探索的淀南浦東區。

<sup>115</sup> 晚近有關這一方面綜合性的論著可以參考高王凌，〈關於清代的江蘇經濟〉，《清史研究集》8(1997)：174-195。

<sup>116</sup> 清·鄭光祖，《一斑錄》，雜述，卷一，收入洪煥椿，《明清蘇州農村經濟資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頁276。

<sup>117</sup> 至正《崑山郡志》，頁2607。

## 二、淀南浦東區

淀南浦東區乃泛指淀浦河以南和黃浦江以東的蘇南東南角一大塊。主要由於黃浦江的阻隔，本區絕大部份相對於蘇南其它地區，呈現出一種自然孤立的態勢。時至今日中國大陸正標榜積極開發浦東，所謂浦東，指的正是本區黃浦江以東，跨部份上海，以及全部川沙、南匯和奉賢縣的廣大範圍。既然標榜積極開發，正反映當地原本相對落後。至於本區南部如金山縣等，也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由於現代石油化學工業等的帶動，才促使當地在短期間內比過去有較顯著的改變。如果時光倒流，退回到四百多年以前的一五五〇年代，以市鎮興起代表區域內一定程度的人口聚集和商業發展，則整個淀南浦東區堪稱是地廣人稀，有些地帶甚至可說是不毛之地。最顯著的，莫過於東南角里護塘以外地區，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都還不曾出現過任何的市鎮。其實直到十五世紀時，這個地區很大一部份，都還在海平面以下。因此，圖一、二沿里護塘內側不遠處出現的幾個鎮，實際上就在昔日的海岸邊上。

總體而論，淀南浦東區市鎮的分佈，較之上節所論的鹽鐵塘主幹區更為稀疏。不同的是，鹽鐵塘主幹區內市鎮有沿主要河川呈帶狀分佈的趨向，而淀南浦東區則完全呈隨機分佈狀，了無規則可言。基於市鎮這種分佈特性，如果說鹽鐵塘主幹區的開發有沿主要河川向外拓張的趨勢，則淀南浦東區的發展，似乎主要是基於個別塊狀地區的開發，則早期沿海鹽業的發展，應在其中起過重要的作用。

淀南浦東區的黃浦江以東和以南地區，也就是明清一般所習稱的松郡南部，在宋以前一直是重要的鹽產地。史料載：晉時「吳郡（松江地區當時統由吳郡管轄）沿海之濱有鹽田，相望皆赤鹵。」陳時「（吳郡）海濱廣赤（鹵），鹽田相望，吳民煮海為鹽。」以後陳椿在《熬波圖》序中更明白指出：「華亭（松江舊稱）東百里，實為下沙濱海，枕黃浦，距大海，襟帶吳淞、揚子二江，直走東南赤鹵之地，鬻海作鹽，其來尚矣。」北宋乾、淳（963-994）年間，松江濱海一帶還置有浦東、袁部（袁浦）、青村、下沙、南澹五處鹽官廨舍，下轄若干鹽場。日後由於東部海岸線不斷地向外延伸，部份鹽場脫離海水浸灌而致土脈淡化，另一方面由於太湖水系的變化，近岸的海水受激流沖盪，鹽分也有淡化傾向，以致新生的海岸灘涂不易成為鹽田，鹽業乃有減產趨勢。<sup>118</sup> 儘管如此，明初以來鹽

<sup>118</sup> 本段所引的史料原文，以及關於松南沿海地區鹽業發展的背景，均取自何泉達，〈吳中

業猶存，早期鹽業促成人煙聚集所形成的一些聚落，成為明清市鎮的前身。迄一五五〇年為止，在這個地區出現的一些鎮，尤其較具規模者，其早期聚落的生成，或多或少都和鹽業有不解之緣。因此，看來雖然地勢較偏僻，市鎮的分佈又雜然無章，但淀南浦東局部地區的開發與某些市鎮發展的相輔相成，其歷史久遠的程度，不稍遜於吾人在鹽鐵塘主幹區之所見。

明初曾設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於杭州，下設松江分司於本區南匯境內的下沙鎮（南52），以同知或副使一員蒞之，統新舊八（鹽）場共二十七團灶戶，分給柴蕩工本鈔，督辦鹽課。正統（1436-1449）以後，灶戶額定共27,853丁，分屬浦東場四團、袁浦場五團、青村場四團、下沙場五團、下沙二場三團、下沙三場三團、清浦場三團和天賜場。<sup>119</sup> 這些鹽場基本相對應於宋代的浦東、袁部（袁浦）、青村、下沙和南澮各鹽官所轄的鹽場範圍，位置則由金山縣沿海依逆時針方向到黃浦江口一帶，涵蓋整個淀南浦東的海岸地區。<sup>120</sup> 所有場屬灶丁和其家庭成員，自然構成當地最基本的人口。一五五〇年為止，淀南浦東區大大小小的三十六個市鎮中，與鹽業產銷有涉而興的不在少數。以下擬自北向南依順時針方向，針對一些較具規模的鎮，探索其起源及一五五〇年止所反映周邊發展的概況。

---

水利與濱海鹽利——兼論明清兩代上海鹽業衰頹的原因》，《史林》1991.3：53-58。

<sup>119</sup> 正德《松江府志》，頁273-279。

<sup>120</sup> 關於宋明鹽場相對應關係，正德十二年修正德《金山衛志》所附金山衛營汛防禦圖可供參考，見柳國瑜主編，《奉賢鹽政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場圖13。

表五：明中葉（1550年止）位於淀南浦東區的市鎮

	1	2	3	4	5	6	7
圖一市鎮代號	上7	上14	上15	上71	上87	上90	川28
市鎮名稱	高橋鎮 (清浦鎮)	高行市 (高家行市)	東溝市	三林塘 (西三林塘鎮)	吳會鎮	閔行市	八團鎮 (川沙縣城)
	8	9	10	11	12	13	14
圖一市鎮代號	奉4	奉11	奉22	奉34	奉37	奉41	奉45
市鎮名稱	泰日橋鎮 (坍石橋)	蕭塘鎮	陶宅鎮 (陶家) (陶檢鎮)	莊家行 (莊行鎮)	南橋鎮 (奉賢縣城)	青村港鎮	高橋
	15	16	17	18	19	20	21
圖一市鎮代號	奉46	松29	松18	松26	松35	松38	松60
市鎮名稱	青村鎮 (奉城鎮)	亭林鎮	松江縣城 +北門+ 莘陽橋	葉謝鎮	柘林鎮	漕涇	北錢市 (北前)
	22	23	24	25	26	27	28
圖一市鎮代號	松70	金21	金31	金40	金57	金60	金62
市鎮名稱	楓涇鎮	朱涇鎮 (金山縣新治)	松隱	興塔市	呂巷市 (璜溪)	楊巷市 (東呂巷保)	張堰鎮 (張涇堰鎮)
	29	30	31	32	33	34	35
圖一市鎮代號	金98	青67	南5	南29	南34	南52	南58
市鎮名稱	小官鎮 (金山縣舊治)	小蒸鎮 (貞谿) (貞溪)	北蔡市	鶴坡市 (施家橋)	周浦鎮	下沙鎮 (鶴沙鎮)	南匯縣城 (惠南鎮)
	36						
圖一市鎮代號	南66						
市鎮名稱	新場鎮						



一五五〇年以前，隸屬圖一所示之上海縣，地處浦東，規模可能達到三級的鎮，只有一個高橋（上7）。其地為南宋清浦鹽場所在，屬南贍鹽官管轄。高橋現址當時尚無聚落，然其東北二里處有一名為清浦的古鎮。其地今日尚多人家，但已無市鎮的機能。清浦最早顯然因鹽業而興，日後清浦場的鹽田因地近長江口受江水水流重力的影響，逐漸塌陷入海，<sup>121</sup> 但清浦鎮卻仍然存在。入明以後，「市居稠密，商賈亦繁，寺屹中央，三庵鼎峙，峨坊矗立，冠蓋喧闐，名人接跡，成弘時（1465-1505）亦一都之會也」。<sup>122</sup> 倭寇之亂時，清浦鎮被毀，市面轉輾集於南，形成高橋鎮。<sup>123</sup> 因此，高橋鎮可以看做清浦鎮的延續與移轉。清以後有關高橋鎮的史料隻字不提鹽業，都稱其地宜木棉，而高橋鎮上的市場交易也惟以棉花、布、米為重。<sup>124</sup> 這足以反映高橋及其前身清浦鎮的周邊，在宋代主要因鹽業而有人煙的聚集，日後隨地利變化，轉以棉業墾殖為重。糧、布交換促成商賈人口的輾集，高橋作為一個商業的集中地，乃得以繼續維持一大鎮的局面。

由高橋鎮沿捍海塘堰一路南下，規模可能達到三級的鎮，首遇南匯城（南58），其次再接新塘往西南走就到青村鎮（奉46）。這一線的內陸地區則有周浦（南34）和新場（南66）兩個三級鎮。早在一五五〇年以前，這些鎮都已頗具重要性。一五五〇年以後，也都繼續在地方商業或政治活動方面扮演較重要的角色。而其早期的興起，則又都與周遭鹽場鹽的產銷有密切的關連。

南匯城後來是雍正三年（1725）始設南匯縣的縣治。周圍原是三團鹽場，屬宋以來下沙鹽官所管。其地始終聚有一定數量的鹽丁灶戶。所以成鎮也與海防有關。明洪武十九年（1386）特在此設守禦南匯營中後千戶所，築有五里周長的城牆，同時又駐有金山衛的分署。<sup>125</sup> 此後直到一五五〇年代，有關南匯城的活動情況，特別是商業方面，卻是了無史料可據以考察。不過，其地日後會發展成縣治所在，之前又因鹽業與軍事而聚集一些人口，單就人丁可能聚集數的角度估量，明中葉當地很有可能已成為一個三級的城鎮聚落。

南匯城西南方青村鎮興起的背景，幾乎與南匯城完全相同，也是基於鹽業和

<sup>121</sup> 祝鵬，《上海市沿革地理》，頁343；又見光緒《重修華亭縣志》（光緒四年〔1878〕），頁258。

<sup>122</sup> 《江東志》（無年代），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1集，頁658。

<sup>123</sup> 《江東志》，頁658。

<sup>124</sup> 《江東志》，頁659-660。

<sup>125</sup> 光緒《南匯縣志》（光緒五年〔1879〕），頁251。

駐軍兩大要素。北宋以來其地是重要的青村（又稱清墩）鹽場所在，歷來鎮的周圍顯然聚集了相當數量從事鹽業生產的鹽丁灶戶。明洪武十九年與南匯城同樣爲了防倭，也在青村鎮設立了中前千戶所，築城周六里長，<sup>126</sup> 青村從此又成爲一個軍事要地。雍正三年奉賢設縣，縣治原設於南橋鎮（奉37），雍正九年（1731）移至青村，直到民國以後也就是一九一二年，才又遷回南橋鎮。<sup>127</sup> 綜言之，同在蘇南面海的前沿地帶，先作爲一個鹽的生產基地，日後兼具有軍事要地性質，進一步又發展成縣治所在，青村鎮與南匯城的發展軌跡，真可說是亦步亦趨。有關鎮上的活動情形，青村也與南匯城一樣，一五五〇年以前幾乎毫無史料可資探索，目前也只能綜合其前後情況，同樣以軍民可能聚集的數量及其軍政屬性研判，明中葉可能已發展成一個三級的城鎮聚落。

南匯城與青村鎮既然都有鹽場和駐軍，但歷來各種版本的地方志，卻沒有任何有關這兩個鎮在一五五〇年以前商業活動的蛛絲馬跡，這只是修志者一時的疏忽，還是因爲與一般商業性市鎮有異，故不及備載？對此一問題，地處南匯、青村後方較偏內陸地區的兩個市鎮——周浦（南34）和新場（南66）的起源，及其一五五〇年以前的發展與機能，或可以有所啓發。

不過既然提到周浦與新場，還得先討論一下下沙（鶴沙）鎮（南52）以及下沙鹽場。下沙鎮介於周浦與新場之間，一五五〇年代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更早在宋代卻是因鹽務而繁興的要鎮。宋代一縣之內如果有一處以上鹽場，往往會設一個鹽監。兩浙地區（包括後來的江蘇與浙江）的鹽場、鹽監很多，又設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總領其事。有一種說法認爲南宋高宗建炎（1127-1130）朝時，在今日下沙地方置有下沙鹽場，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就設在下沙鎮上。其實當時真正產鹽的下沙鹽場是在八團鎮（川28）到南匯城（南58）的沿海一線，下沙鎮偏處內陸，鎮與實際產鹽的鹽場還有一段距離。前面曾提到明初設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於杭州，下沙鎮所設只是鹽使司下的一個松江分司。又有一則時間不明的史料，泛泛提到設於下沙者既非鹽使司也非松江分司，而是一個鹽課司罷了。是否宋以來設置於下沙鹽務機構的層級迭有變化，因而史料所記其實是反映不同年代的事呢？目前對此尙無從深究。不過，無論是鹽使司、松江分司或者是鹽課

<sup>126</sup> 康熙《松江府志》，17：29a-30b；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四，〈江南六·附見〉，頁196。

<sup>127</sup> 李香芳，《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典·上海市》，頁200。

司，下沙鎮自宋以來持續作為一個縣以上層級的鹽司所在大概不會有錯。鹽場本身司鹽的生產，後方鹽使司、分司或鹽課司則主發售與徵稅，許多鹽商當然要聚集其地進行交易與轉運，從而促進了鹽司所在鎮的繁榮。元代主管整個下沙鹽場鹽業產銷的機構遷至周浦鎮，明代正統二年（1437）起又移至新場鎮，這一連串變化，可說是引發下沙鎮衰落，周浦和新場鎮陸續興起的原因。<sup>128</sup>

周浦最遲南宋時已是一個村聚。史料謂元代移下沙鹽場以及杜浦巡司於此，所謂下沙鹽場實際指的就是管理鹽務的官署——鹽課司，而非鹽田本身。<sup>129</sup>鹽的發賣與轉運既集中於周浦，自然也就將原聚於下沙鎮的鹽商轉吸引至此，從而帶動當地各種的商業活動。相對而言，南匯城與青村鎮作為產鹽地區的大聚落，其商業活動卻不見史志著墨，這大概是當地雖產鹽，卻要運到後方如周浦這樣的鎮來集中銷售發配使然吧！

正統二年原下沙鹽課司又從周浦移到新場鎮，周浦鎮可能因而一度步入蕭條期，但稍後恢復繁榮，史志有載：「姚塢，周浦人，成化正德（1465-1520）間，建積廣、永興二橋，又浚義井。時鎮為荒僻地，塢廣建廬舍，招集商賈，漸成大鎮。」<sup>130</sup>周浦復興後，直到一五五〇年為止，可能都維持著一個三級大鎮的規模。清代以後益見發展，這又有新的因素，將在其它文章中再論。

周浦又南的新場鎮原名石筍里、南下沙或石筍灘。<sup>131</sup>明正統二年原下沙鹽課司由周浦遷入，始稱新場，即此一「場」字就透露了鎮與鹽業有關的訊息。<sup>132</sup>當時「北橋稅司、杜浦巡司皆徙居焉。四時海味不絕，歌樓酒肆賈貨繁華，縣未之過也」。<sup>133</sup>鹽課司和北橋稅司皆進駐新場，有稅收自然代表有商業活動。由於析縣以前的南匯地區原屬上海縣管轄，這裡所謂的縣，當指上海縣城而言。如果連一個上海縣城的繁華，都不見比得過新場鎮，早期鹽業帶動浦東地區城鎮發展的作用，可見一斑。如以新場繁榮的情況對照其它鎮如周浦、南匯城等，雖然同

<sup>128</sup> 以上討論主要見諸於祝鵬所引史料，見祝鵬，《上海市沿革地理》，頁339-340。

<sup>129</sup> 祝鵬，《上海市沿革地理》，頁341。

<sup>130</sup> 光緒《南匯縣志》卷一三，人物，轉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123。

<sup>131</sup> 嘉慶《松江府志》，2：30b-31a；祝鵬，《上海市沿革地理》，頁341。

<sup>132</sup> 一般地方志都稱下沙鹽課司於元代遷到新場，據祝鵬考證應在明正統二年，本文從祝鵬的說法，見祝鵬，《上海市沿革地理》，頁339-341。

<sup>133</sup> 正德《金山衛志》（正德十二年〔1517〕），下2：17a-b。

樣都將之歸類為第三級的大鎮，但其中又有大小之別。惜乎史料不足，無法細究。

由青村鎮沿新塘繼續西行，就進入黃浦江以南地區。一五五〇年以前，估計當地達到三級規模的鎮，可能有南橋（奉37）、亭林（松29）、張堰（金62）、朱涇（金21）和楓涇（松70）五個。

前文提到，雍正三年（1725）奉賢初設縣時，南橋鎮為縣治。雍正九年（1731）遷到青村鎮。民國元年（1912）又遷回南橋。傳說其地唐末五代以來即有人居住。元代成為市鎮，設有南橋務與南橋稅課局，明初革除。明太祖初設巡檢司。又於洪武八年（1375）復置南橋稅課司，一直到弘治十七年（1517）才把後者裁撤。<sup>134</sup> 綜觀這一背景，南橋長期以來似乎始終是一個商業匯聚之地。是否與鹽業有關，尚乏直接史料佐證。不過，南橋附近近海的柘林鎮（松35）周圍，正是前文所提宋代袁部（袁浦）鹽官所轄袁浦鹽場的大本營。<sup>135</sup> 以二者相關位置而言，南橋唐末五代以來的發展，不太可能與鹽業脫卻關係，很可能是袁浦鹽場產鹽向外流通的要站。明以來史料之所以完全不提南橋鎮與鹽的關聯性，關鍵可能在於鄰近海岸線經長期的變化，舊袁浦鹽場已不產鹽。

前曾提到蘇南海岸線長期以來有向東延展的趨勢，基本上這是就蘇南正東面海之地而言。正南方大約是青村西向到浙江沿岸，也就是沿杭州灣北岸地區，自古以來則是不斷地坍塌入海。今日孤懸海上的大小金山其實原都與陸地相連。明初當蘇南海岸線一方面向東逐步外推時，南岸則向內已收縮到柘林鎮一線。<sup>136</sup> 宋以來的袁浦鹽場此時都已紛紛坍塌入海。南橋鎮原在鹽業集散方面的地位，此時自然大受影響。不過從圖一、二上看，南橋鎮跨南橫瀝港，沿此港北行過黃浦江與北橫瀝港相通，進一步又上接鹽鐵塘。明中葉時沿岸都是鹽鐵塘主幹區內一些既存的要鎮。儘管南橋偏東稍遠的青村鹽場繼續產鹽，不過此時位居溝通浦南與浦北有利的地理位置，很可能轉成為南橋鎮得以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再者如前所述，青村鎮雖為奉賢縣治，但實以駐軍為主，全縣一般民間的商業活動可能還是以南橋鎮為盛。清末當奉賢縣治還在青村鎮時，南橋就因商業因素而被奉為奉邑的首鎮，青村反屈居第二，原因可能就在於此。<sup>137</sup> 據此推論，清代奉賢設縣後不久，所以會把縣治由南橋移到青村，就如同南匯把縣治設在近海的南匯

<sup>134</sup> 《奉賢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129。

<sup>135</sup> 柳國瑜主編，《奉賢鹽政志》，頁13-14所附場圖。

<sup>136</sup> 張修桂，〈上海浦東地區成陸過程辨析〉，《地理學報》53.3(1998)：228-235。

<sup>137</sup> 光緒《重修奉賢縣志》（光緒四年〔1878〕），頁107-109。

城，而非後方更繁榮的新場或周浦鎮一樣，主要可能都是軍事更重於社會經濟因素的考量。目前有些研究經常提到，明清江南一些鎮的繁盛竟然凌駕於縣城之上，其實必須要考量此一因素。

明中葉南橋鎮再往西行，會遇到松江縣境內的亭林鎮。其地歷來相傳，早在南北朝梁、陳年間，著名的文字訓詁學家顧野王嘗遊學隱居於此，其宅旁有林，人稱「顧亭林宅」，日後亭林鎮之名就源自於此。<sup>138</sup> 如果此一傳說屬實，則當地開始有人煙的時間，應該比上述始自唐末五代的浦東各鎮還要早。然而明清各種地方志中與鎮相關的記載卻極少，只知終明清之世，一直有金山巡檢司駐紮。<sup>139</sup> 目前只能根據當代人：「亭林於唐代成集市，元稱『務』，明清為浦南地區糧、棉集散地，有浦南重鎮之稱。」<sup>140</sup> 這一句含糊籠統的說詞，研判亭林鎮一五五〇年為止的規模，有可能與南橋、青村鎮等，屬同一等級。

亭林西南方十五公里處是張堰鎮。前所提到的宋代浦東鹽官或明代松江分司下屬的浦東鹽場，就分佈在張堰附近海邊的金山衛城（金98）周圍。張堰早期的崛起，應該說與該鹽場有絕對的關連。張堰鎮所依傍的新涇（河），是浦東鹽場的鹽運往華亭縣城（今日松江縣城）所必由，唐末五代當地就有浦東場鹽課司大使署。<sup>141</sup> 宋乾道（1165-1173）年間，由於在張堰築堰截斷新涇，大批鹽船在此過關要排隊等候，人船既被阻於此，這對於促進張堰鎮的進一步發展，實有推波助瀾的效用。<sup>142</sup> 宋元主管浦東鹽場的鹽課司一直都設在張堰鎮上。明初又設有稅課局。由於鹽的產銷引起一些商業活動，所以元時形容其地「蕃庶殷富風雅」。明以後浦東鹽司因去鹽場已遠，乃在金山衛城別建官衙定期進駐。<sup>143</sup> 但這毫不影響張堰鎮的地位，因為「商賈畏軍強，莫敢往衛，止於鎮，凡衛之貿易者日雜還于塗，鎮由是益盛」。<sup>144</sup>

正統（1436-1449）初年，指揮使劉惠、同知王勝禁官軍無得凌暴，商賈貨物

<sup>138</sup> 《金山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129。

<sup>139</sup> 正德《松江府志》，頁333-336；光緒《重修華亭縣志》，1：13b-14b。

<sup>140</sup> 李香芳，《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典·上海市》，頁213。

<sup>141</sup> 《金山縣志》（1990），頁128。

<sup>142</sup> 祝鵬，《上海市沿革地理》，頁333。

<sup>143</sup> 乾隆《金山縣志》（乾隆十六年〔1751〕），頁87-88。

<sup>144</sup> 正德《金山衛志》，下2：16b-17a。

得以直接進入金山衛城，張堰「鎮遂荒落矣」。<sup>145</sup> 這一盛一衰的轉折，其實透露一個訊息，就是鹽業對張堰鎮興衰與否的影響已大為降低。這又牽涉到海岸地區自然地理環境改變的問題。正如同上述的袁浦鹽場，浦東鹽場自宋以來也不斷坍塌入海，而且情形比上文所說的袁浦鹽場似乎更為嚴重。清光緒五年（1879）所繪華亭縣圖沿海部分的文字說明，便明白指出，浦東鹽場為海潮冲刷而久已無存。<sup>146</sup> 然而，張堰並未因此而衰亡。上述商賈直接赴金山衛經商所導致的「荒落矣」，不過是短暫的現象。至少近百年後，到一五五〇年倭亂以前，張堰鎮仍然是「土田豐厚，戶口千記。南面金山，以瀕大海；北拒松隱（金31），以接郡治；東帶王墳涇，以通亭林；西逾秦山，以至干巷。地方廣遠，規模形勝，非它鎮比」。<sup>147</sup> 清以後，史志中有關張堰鎮的記載，只提到當地以糧、布市為重的現象，而全不及於鹽的交易。<sup>148</sup> 這種早期倚重鹽業，日後改以布、米交易為主，應該就是張堰鎮本身得以持續不衰的關鍵。而這一轉型，也代表宋元以來整個淀南浦東特別是近海地區，土地利用情況的變化，這其實是一個長達數百年以上的漸進過程。

據圖一所示，明中葉，唯一與張堰同在金山縣境內的三級大鎮，就是稍偏內陸的朱涇。其地當秀州塘轉折處，是浙江嘉興、湖州地區與松江府城往來所必經的要道，向以險要著稱。<sup>149</sup> 元至元十四年（1277）置大盈務，<sup>150</sup> 這標誌著當地的商務活動已有所發展。不過，當時的務乃設在「王家村北」，<sup>151</sup> 很可能日後的朱涇鎮，當時還只是一些村落聚集其間。百餘年後到明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這種情況已大有改變。朱涇「居民數千家，商賈幅輳，置郵走兩浙，達兩京者，旦暮不少」。<sup>152</sup> 另外不著撰人的〈朱涇買柴灣水道碑記〉，也泛指朱涇「當水要衝，為郡屏蔽者。……有明時，戶口殷繁，閭閻充實，雖都會之盛無

<sup>145</sup> 同上。

<sup>146</sup> 柳國瑜，《奉賢鹽政志》，頁18所附場圖。

<sup>147</sup> 乾隆《金山縣志》，頁847-850。

<sup>148</sup> 《重輯張堰志》（民國九年〔1920〕），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2集，頁401-402。

<sup>149</sup> 乾隆《金山縣志》，頁58。

<sup>150</sup> 《金山縣志》（1990），頁124。

<sup>151</sup> 乾隆《金山縣志》，頁87-88。

<sup>152</sup> 正德《松江府志》，頁366。



以加之。」<sup>153</sup> 顯然位居水路交通要津，商旅財貨自然匯聚，朱涇因而興起。不過，不同於前述幾個興衰演變多與鹽務有涉的鎮，朱涇始終以布貨交易為主要商業活動。而且由於交易甚為繁盛，在明代已有「小臨清」的稱號。<sup>154</sup> 朱涇主要的商業活動與鹽業無關，興起的時間似乎又較上述與鹽有關的各個大鎮為晚，其之得以發展，優越的地理條件當然是要素之一，但更重要的，可能還是趁著與張堰逐步轉型的同一大勢，也就是「松江產布自元元貞（1295-1296）間黃道婆教習後，著名海內」，<sup>155</sup> 開始緩步啟動的。

一五五〇年為止，在朱涇以西十四公里處正好位於江浙的邊境上，另有一個三級的楓涇鎮。該「鎮始於宋時，至元明而戶口日繁，市廛日盛」。<sup>156</sup> 其之興起，背景與朱涇極為近似。首先就地理位置言，楓涇與朱涇均瀕臨秀州塘，同屬江浙往來的要衝。為便於行旅，宋初就曾在其地設置驛站。<sup>157</sup> 元至正八年（1348）左右，鎮上已有「居民無慮數百家」。<sup>158</sup> 入明以後，有關鎮的記錄，最凸出的，就是清代顧公燮所記「前明數百家布號，皆在松江楓涇、朱涇樂業」這一則史料。<sup>159</sup> 以顧公燮所處的年代判斷，所謂「前明」當以明中晚期的成分居高。當時僅以布號之多，就足以反映楓涇應較元代又有所發展。如同推進朱涇發展的動因一樣，蘇南新興棉業對楓涇自元明以來蔚為大鎮，顯然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上述各三級鎮外，一五五〇年為止，整個淀南浦東區，只有松江府城（松18）是大型商業聚落兼地方行政中心。其所在位於黃浦江北，就淀南浦東區本身觀之，相對上述諸鎮，實侷促一隅。但從整個蘇南地區來觀察，前述諸鎮實僻處海隅，松江府城則地處較老的開發區中，政治上因而遙領上述各鎮。其地原本發展甚早，早在唐天寶十年（751）初置華亭縣時，為縣治。元至元年間（1335-

<sup>153</sup> 《朱涇志》（嘉慶九年〔1804〕），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1集，頁1007。

<sup>154</sup> 《朱涇志》，頁988。

<sup>155</sup> 《朱涇志》，頁993。

<sup>156</sup> 《重輯楓涇小志》（光緒十七年〔1891〕），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2集，頁2。

<sup>157</sup> 嘉慶《松江府志》，2：25b-27a。

<sup>158</sup> 《續修楓涇小志》（宣統三年〔1911〕），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2集，頁173。

<sup>159</sup> 清·顧公燮，《丹午筆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芙蓉塘〉，頁104。



1340)，設松江府，以之領華亭、婁縣。原華亭縣城升格為府城。明清以來迄今，當地始終是松江府、縣治的所在。關於明中葉松江府城的社會經濟概況，由於史料闕如而無從瞭解。不過，以其地長久以來做為府、縣治所在，又見其民國以來迄今日的發展，稱其為整個淀南浦東區的第一大城鎮聚落，當無庸置疑。

所有上述各三級大鎮日後進一步被擢昇為縣城的，分別有南匯城、青村、南橋和朱涇各鎮。至於未曾升格的如周浦、新場鎮等，也都可以確定有進一步的發展。這些鎮以外，到一五五〇年為止，還有少數幾個粗具規模或可列為二級的鎮，其日後則境遇各殊。這些鎮分別是高行（上14）、三林塘（上71）、八團（川28）、北蔡（南5）、陶宅（奉22）、閔行（上90）、葉謝（松26）、松隱（金31）、呂巷（金57）、楊巷（金60）和小蒸（青67）各鎮市。高行、三林塘、八團、北蔡、閔行、葉謝、松隱、呂巷各鎮，日後都有進一步的發展；陶宅、小蒸迄今尚存，但自十六世紀以來幾乎長期沒有發展；楊巷則明中葉以後日益衰微，最後在地方志中都不再被列入市鎮之林。繼續成長的鎮，依其發展期將在另文中再論。至於停滯不前、衰微或甚至以後都不再見載於史志的鎮，凡其經歷堪供瞭解蘇南城鎮化性質一端的，略述如下。

陶宅鎮始於元代，當時有陶氏著姓居之。先是「陶宣車面流而居，故其溪曰陶溪，宅曰陶宅，陶饒于資，北宅千灶」，<sup>160</sup> 鎮可能因之而興，逕稱陶宅。一直到明正德（1506-1521）年間，當地還有巡檢司、稅課局之設，<sup>161</sup> 這反映當地應該是一個商業集中的點。嘉靖（1522-1566）年間倭亂以後，鎮乃一蹶不振。<sup>162</sup> 入清以後方志仍載其為鎮，但實況則無任何敘述。小蒸鎮地處松江府城入浙的孔道上，據稱宋元時「人煙稠密，……為一邑望，鋪戶毗接」。明代「居此者多文人韻士」，也曾設有巡檢司和稅課局，但倭亂後也衰敗。<sup>163</sup> 楊巷一直到明末，和「呂巷俱稱市，與朱涇鱗次鼎分」。<sup>164</sup> 朱涇與呂巷俱以紡織業而盛，向有「朱涇錠子呂巷車」的諺語。入清以後呂巷與朱涇繼續發展，楊巷則湮沒無聞。原因何在？可從其所處的地理位置上試為探索。從圖一、二上來看，楊巷與呂巷

<sup>160</sup> 鍾薇，《陶溪舊址記略》，轉引自祝鵬，《上海市沿革地理》，頁337。

<sup>161</sup> 正德《金山衛志》，下2：16a-17a。

<sup>162</sup> 李香芳，《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典·上海市》，頁203-204。

<sup>163</sup> 《蒸里志略》（宣統二年〔1910〕），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2集，頁729-730；萬曆《青浦縣志》，2：4a-5a。

<sup>164</sup> 崇禎《松江府志》，3：1a-7a。

原來相去不過僅一公里之遙，因此，與其說楊巷日後單純趨於衰亡，不如說是其功能漸為呂巷所取代。不過功能的取代，絕不等於市鎮擴大，以致於進行實體的兼併。關於兼併的例子，明清蘇南市鎮的發展過程中其實極為罕見。未來在續論明中葉以後整個蘇南市鎮的發展時，一方面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市鎮相鄰甚近，一方面卻又長期相互獨立存在，可為之佐證。

## 小結

綜上所述，基於市鎮興起與周邊地區發展互為表裡這一考量，淀南浦東區的開發，基本上可以以松隱（金31）和張堰鎮（金62）一線區分為東西兩部份。以東，鹽業對促進地方的開發與市鎮的興起，實居關鍵性的作用，其次就是軍事防衛的要素。由圖一、二所見，松隱、張堰一線以東環海之地，唐宋以來就有浦東、袁浦等鹽場，當地到明中葉時，對一些既存的大鎮而言，其早期的形成與發展，幾乎都肇因於鹽丁灶戶和鹽商的聚集。此外，明初以來為了防倭，在南匯城（南58）和青村鎮（奉46）等地大量駐軍，兵丁日常所需促進地區物資的交流，無形中對城鎮進一步的發展，起了正面的效用。

松隱、張堰一線以西已位於江、浙接壤處。當地諸大鎮從聚落開始形成到發展，鹽業扮演的角色相對較不顯著。其中松江府城（松18）自唐代以來就一直是當地的行政中心。時至一五五〇年代止，其發展除基於普通的商業活動外，特定的政治機能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朱涇（金21）與楓涇（松70）則都位居江、浙往來的交通要道上，周圍地區的自然環境與鄰近的嘉興、湖州地區類似。其實從行政沿革史的角度來觀察，整個淀南浦東區在唐代相對於杭州，統被納入蘇州管轄；宋代無論轉歸入秀州或嘉興府，政治中心皆指向今浙江境內的嘉興市；元明時松江府乃由浙江境內的嘉興府析之而出。基於這一背景，可見松江、朱涇、楓涇所在與鄰近湖州、嘉興地區，無論是就自然環境或歷史淵源而言，都關係頗深。兩地最早的發展或可視為一體。元明以來蘇南地區引進棉業，本地蒙其利，乃有朱涇、楓涇鎮的大興，竟分別號稱「小臨清」，或鎮有「數百家布號」。連帶原以鹽業為重的張堰鎮，也轉化成一個棉業發達的市鎮，而與其它仍以鹽業為主者有所區別。

最後就市鎮在淀南浦東區與上述鹽鐵塘主幹區的發展綜而言之，尚有一事值得注意。那就是有些大鎮在產鹽地帶的發展原本還早於棉業地區，但發展到一五

五〇年以前這個階段，除極少數如新場鎮（南66）的繁華，史有明載外，其他與鹽業相關各大鎮的發展概況，能見於地方志者，資料遠不如以棉業為重的各鎮來得豐富與明確。這究竟是修志者有意無意的省略，抑或出於原本可記者就少呢？就目前看來，似乎以後者的可能性居高。如果屬實，則反映鹽業帶動市鎮發展的活力似乎遠不及棉業。真實情況如何，或許還值得做進一步的研究。

### 三、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

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指的是蘇南環太湖向東延伸到與前述鹽鐵塘主幹區和淀南浦東區交會的地帶。（見圖二）此區顧名思義，除有大運河縱貫其間以外，湖群沼澤地的充斥是一大特色。雖然從一張大小河川鉅細靡遺的蘇南地圖上來看，<sup>165</sup>水系在鹽鐵塘主幹區和淀南浦東區的分佈同樣也星羅棋佈，密度甚高，不過，當地水域成面狀分佈的程度，則遠比不上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後者在蘇州城（吳39）以南，尤其是吳江縣境內，絕大部份地區都是湖泊沼澤，陸地面積相對顯得非常稀少。江南是一般人所謂的水鄉澤國，然而用水鄉澤國來形容這個地區，則尤為真切。

一五五〇年為止，在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包括府縣城在內，總共發展出了三十八個市鎮，佔蘇、松、太全區當時一百六十一個市鎮的24%。（見表六）由於水域面積廣大，市鎮在本區的分佈，相對於鹽鐵塘主幹區和淀南浦東區，顯得更為零散。不過市鎮數量雖少，本區三級以上大鎮在全區市鎮中所佔的比例卻很高，一共有十六個，達到全部三十八個市鎮中的42%。這是其他兩個地區所不及的。又區內的蘇州城一直到近代開港通商以前，不只是在整個江南地區，就以全國範圍而言，也是名列前茅的大工商業中心。再者本區環大運河流經地帶，其開發之早也遠非鹽鐵塘主幹區和大部份的淀南浦東區可以相比。基於這些特點，以下仍循前各節模式，集中以本地一些較重要的市鎮為主，深入探討其與周邊地區之間一些共生共榮的關係。

<sup>165</sup> 參見〈市鎮分佈與地域的開發——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圖二。

表六：明中葉（1550年止）位於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的市鎮

	1	2	3	4	5	6	7
圖一市鎮代號	吳7	吳14	吳23	吳26	吳31	吳37	吳38
市鎮名稱	相成市	黃埭市	許市鎮 (許墅)	陸墓鎮	山塘	楓橋	月城市
	8	9	10	11	12	13	14
圖一市鎮代號	吳39	吳41	吳42	吳49	吳51	吳52	吳53
市鎮名稱	大市市 (蘇州府城)	王墓市 (王村墩)	光福鎮	橫塘鎮	角直鎮 (陸直浦) (甫里鎮)	木瀆鎮	新郭鎮 (新郭橋鎮)
	15	16	17	18	19	20	21
圖一市鎮代號	吳60	吳68	吳71	吳84	吳江1	吳江2	吳江3
市鎮名稱	尹山市 (尹山村鎮)	橫金鎮 (橫涇鎮)	陳墓鎮	社下鎮 (夏鎮)	莫舍村 (綺川) (涇上鎮)	縣市 (松陵鎮)	同里鎮
	22	23	24	25	26	27	28
圖一市鎮代號	吳江4	吳江5	吳江9	吳江10	吳江21	吳江22	吳江23
市鎮名稱	龐山村 (大小龐山)	屯村市	八坼 (八斥) (北尺鎮)	充浦 (四都村) (廟前)	梅堰	平望鎮	黎里鎮
	29	30	31	32	33	34	35
圖一市鎮代號	吳江24	吳江25	吳江28	吳江30	吳江33	吳江35	青59
市鎮名稱	吳淞村 (湖淞鎮)	雙楊	震澤鎮	檀丘	新杭市 (沈家濱)	嚴墓	金澤鎮
	36	37	38				
圖一市鎮代號	常79	常81	常88				
市鎮名稱	虞山鎮 (常熟鎮) (縣市)	楊尖市 (楊尖鎮)	練塘市				

從圖一上看，北邊常熟縣境內的常熟縣城（常79）恰好位於本區與鹽鐵塘主幹區的交界線上。清雍正四年（1726）常熟一分為二，成為常熟與昭文二縣，兩縣共治於常熟縣城。縣的分界大致以縣城為中心，北沿福山塘到福山鎮（常25），東南則斜出縣城抵崑山縣界。此線以東是昭文縣，另包括福山以北日益浮出水面的沙洲區，幾乎全都位於鹽鐵塘主幹區內。以西的新常熟縣，則絕大部份位於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範圍內。以東西分成兩個縣的常熟來看，截至一五五〇年為止，東部昭文境內市鎮的分佈，明顯要比西部常熟境內為多。西部除縣城以外，總共不過只有兩個一級的小鎮，分別是楊尖市（常81）與練塘市（常88）。如果擴大範圍從新常熟向南延展到吳縣縣城，包括蘇州城一線以東和吳江縣以北，也不過是多增加了相成市（吳7）、王墓市（吳41）、甬直鎮（吳51）、尹山市（吳60）和陳墓鎮（吳71），三個一級鎮以及兩個三級鎮罷了。其中甬直鎮、尹山市和陳墓鎮都分佈在本區南部的邊緣地帶，廣大中間地帶不過只有相成市與王墓市而已。偌大地區市鎮的分佈誠可謂寥落至極。固然該域內自北而南相繼有昆承湖、陽澄湖、澄湖和部份澱山湖，水多地少，但更往南，吳江縣境水域面積其實更廣，市鎮反而相對較多，鎮的規模也相對較大。據此可見，市鎮數量的多寡，顯然並非可簡單歸因於陸地面積的廣窄。

大體而言，明中葉這段期間，跨常熟縣城以及蘇州府城兩斜線之間，一直延伸到包括吳縣東南角這一大片範圍內，市鎮發展水平之所以如此低，一方面可歸因於蘇、松、太全區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都不高外，針對本地的一個關鍵要素，可能就是當地的農業經濟型態不同於蘇、松、太其它地區。當地基本上是以單一的稻作為主。與棉或絲業發達地區相比較，這樣的生產活動在缺乏手工業以及其它各種經濟分工的前提下，可帶動地區商品化的作用較弱，連帶促成市鎮發生的可能性降低。此可由常熟縣的歷史與經濟背景來做說明。

如前所述，當代常熟的主要部分，明清曾一度分成常熟與昭文兩個縣。由於境內福山鎮以北和岡身以東屬持續淤漲地區，因此，縣早期涵蓋的範圍並不如日後之廣。就整個蘇南而言，常熟屬於設治較早的地區，早自西晉太康二年（281）當地就已置縣，先後名海虞、南沙或海陽。後來冠以常熟之名，則是梁武帝大同六年（540）以後的事。<sup>166</sup> 儘管如此，本地真正開始有較顯著的開發，還是要等

<sup>166</sup> 魏嵩山，《太湖流域開發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頁27；《常熟市志》（1990），頁76-77。

到唐末五代以後。

五代時吳越的錢鏐等，在江南地區大力推動塘浦圩田的政策。這基本上就是與水爭地，想藉溝洫建築積極排水，俾將蘇南浙北的低地化為良田。當時營田工作很重要的一部份，就是在常熟地區展開。<sup>167</sup> 宋代人認為常熟「五浦皆注於江，東則白茅浦；東北許浦；正北福山浦；西北黃泗浦、奚浦。五浦常濬，則潦無漲溢之虞，旱獲灌溉之利。邑名常熟實本諸此。」<sup>168</sup> 元代則相傳常熟「或以土壤膏沃，歲無水旱而名歟」。<sup>169</sup> 這些本來都是指五代以來大力治水以後的事，而上述常熟縣之名則始見於梁代，是故，後來有關常熟之所以得名的說法，實有其穿鑿附會的一面。不過，這卻無損於常熟縣歷來「常熟」的這一事實。

根據現存史料所見，最早在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孝宗駐蹕臨安城時，所謂環府（臨安）之邑一共有五，而「常熟居其望焉」。臨安每年仰仗其「資糧鉅萬」。<sup>170</sup> 下逮明清時，常熟作為一個地區性糧倉的性質依然沒有改變。明代到一五五〇年左右這個階段，有所謂的「常熟雖僻遠，其貨常給乎外境。每歲杭、越、徽、衢之賈，皆問糴於邑。其人弗至，則食之價平矣」。<sup>171</sup> 晚清的史料更說常熟：「土膏之腴，其禾稼遍野彌望，無尺寸隙」，「又饒湖陂之利，凡生殖品匯，所以資邑人之食用及運販而之他方者，殆不可勝數。」<sup>172</sup> 常熟這種盛產米糧的情形當然並非遍及全縣，主要還是指位於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的這一部份。東側鹽鐵塘主幹區內的常熟，也就是清分縣以後的昭文部份，向以岡身高田為多，本不適宜種稻，只有待元代棉種傳入之後，當地的田土方得到適當利用。影響所及，到一五五〇年前後，常熟一方面有餘米外銷杭、越、徽、衢等地外，「至於貨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載舟輪，行賈於齊魯之境，常什六」。<sup>173</sup> 從自然環境與土地利用的角度觀之，常熟顯然已發展成各以棉、米生產為重的東、西兩大部份。

<sup>167</sup> 鄭肇經主編，《太湖水利技術史》（北京：農業出版社，1987），圖4-2 五代吳越時期塘浦圩田示意圖，頁85。

<sup>168</sup> 至正《重修琴川志》（至正二十三年〔1363〕），頁2659。

<sup>169</sup> 至正《重修琴川志》，頁2649。

<sup>170</sup> 紹定《吳郡志》（紹定二年〔1229〕），頁1096-1097。

<sup>171</sup> 嘉靖《常熟縣志》，頁385-386。

<sup>172</sup> 光緒《重修常昭合志稿》，轉引自范金民、夏維中，《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434。

<sup>173</sup> 嘉靖《常熟縣志》，頁385-386。

基於相鄰的地理位置以及類似的自然環境，常熟產米這一區，其實可以擴及蘇州城以東、吳江縣以北的吳縣部分，此正相當於上述跨常熟縣城以及蘇州府城兩斜線之間，一直延伸到包括吳縣東南角的這一大片範圍。全區一體觀之，當地既不像蘇州城一線以西，有作為商業大動脈的大運河通過；其以南吳江縣境內則向以絲織業為重；東邊鹽鐵塘主幹區一方面有棉業，又有對外通商要港；淀南浦東區則有鹽業兼棉業。綜合各該區特點，假設以絲、棉生產為主連帶引起的各種經濟活動，或者是優越的交通要素等，有助於提昇一地的商品化活動，從而可促進其商業聚落的發展，在稻作區由於單純的米糧生產與交易所能帶動的商品化程度相對有限，如果這一說可以成立，本地城鎮化尤其低落的現象，主要或可歸因於此。

明中葉時，整個常熟西半部以及相連的部份吳縣境內，最大的一個城鎮應該就是常熟縣城（常79）。其地歷史久遠。當西晉太康二年（281）初置海虞縣時，縣治所在的海虞城就是日後的常熟縣城。其後縣治移駐南沙城，也就是今天的福山鎮。唐武德七年（624）縣治又移回到舊海虞城，後此乃一直維持到今天。關於明中葉前後常熟縣城的實際概況，從一般明清方志中幾乎無從得知。不過，明人文集中有一條時間不詳的記載說：「（常熟縣城）四方商人輻輳其地，而蜀鱸越舵晝夜上下于門」，<sup>174</sup> 以其地當縣治千年以上，又有四方商人聚集其地，捨其作為縣治應有的政治機能不論，單以本文對明清蘇南一般市鎮的分類標準而言，其規模長期可維持在三級以上應當是無庸置疑的。

常熟縣城以外，明中葉常熟西半部僅有兩個一級小鎮，其中楊尖市（常81）有住戶「二百家，中有衢路」；練塘市（常88）則居民僅「百餘家」而已。<sup>175</sup> 從商業化的角度觀之，兩鎮地位俱無足輕重。以此綜合常熟東西兩半來看，常熟縣城宛如前述的崑山縣城（崑6）一般，是在相當範圍內一個頗為孤立的商業薈萃點。就當時的歷史狀態而言，這或許代表其周邊可促進商業化的生產力，是有相當侷限性的。

常熟以南吳縣境內蘇州城以東和吳江縣以北地區的五個鎮中，王墓市（吳41）和尹山市（吳60）都在清道光朝以後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從當代五萬分之

<sup>174</sup> 明·吳寬，〈贈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楊公墓表〉，收入《匏翁家藏集》（明·吳寬撰，〈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75：8b。

<sup>175</sup> 嘉靖《常熟縣志》，2：7a-9b。



一的地形圖上判讀，兩鎮原址現在還分別有王村墩和尹山鎮村兩個小聚落，這很可能就是由前期的市鎮退化而來的。不過，即使當王墓和尹山兩市在歷代地方志中都還被歸類為鎮時，所有相關記錄，也不過就是兩個鎮的鎮名罷了，鎮的規模或鎮上實質的活動內容均無跡可尋。這反映兩鎮本身在蘇南地區城鎮化的過程中，可能從未扮演過任何重要的角色。

本區在吳縣境內的另外三個鎮，由北而南分別是相成市（吳7）、甬直鎮（吳51）和陳墓鎮（吳71）。相成市緊鄰陽澄湖畔，雖然早在明正德元年（1506）的《姑蘇志》中就已見諸記載，而且一直延續至今，但其相關概況卻要到民國以後才稍有記錄可資瞭解。明清吳縣一度分成吳縣、長洲和元和三縣，相成地屬長洲，曾有「縣中四大鎮之一」的說法。但所指顯然是包括鎮整個轄區範圍，並非單指工商所聚的相成鎮區本身。因為即使到民國時，相成鎮實際上「轄區五，領圖五十有二，制村七十有三」，狹義的鎮區本身則不過只有二百四十一戶人家而已。<sup>176</sup> 如果向前回溯到一五五〇年前後，除非相成鎮區本身日後曾經歷過劇烈變化，否則以後推前，作為一個鎮，其規模與作用恐怕是要小之又小的。而所謂一縣中的四大鎮之一，對鎮的規範與定義實不能不先有所釐清。

甬直和陳墓兩鎮雖然同被劃入以單一稻作為主的地區，但本身所處的地理位置，卻導致其發展與上述幾個鎮截然不同。地理位置上，兩鎮最大的特色就是位於吳縣與崑山縣的交界處，也就是介於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以及鹽鐵塘主幹區兩大範圍的過渡地帶。推進兩鎮發展的動力，源自兩大區之間人員商品的流通，可能更甚於其本身及周遭地區生產力的積累。

甬直鎮（吳51）又稱甬里鎮，地近吳淞江，明清時為蘇州通上海地區所必經，今日蘇州上海間的快速道路仍通過其地。一五五〇年以前，只有嘉靖十七年（1538）的《崑山縣志》曾說其地「廬舍相錯」。<sup>177</sup> 較詳細的情況，則見諸後來萬曆七年（1579）與十二年（1584）兩則與鎮有關的記載。一說「我里僻在常洲邑治之東，沃然水壤，其土瘠，穀粟之外無他產，其民習捆織之外，無他業。間有貿易，亦不過轉輸邑市之貨，規蠅頭利而已，非通衢巨鎮商賈輻輳比也」。<sup>178</sup>

<sup>176</sup> 《相城小志》（民國十九年〔1930〕），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8集，頁25-26, 57-59。

<sup>177</sup> 嘉靖《崑山縣志》（嘉靖十七年〔1538〕），4：1a-2a。

<sup>178</sup> 《吳郡甬里志》（康熙四十三年〔1704〕），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5集，頁446。

另一則則說「（甬直鎮）其經則南達越閩，北通青兗，百貨居儲，巨商時輟；緯則左承渤海，右匯具區，風帆浪槳，特艦駢鱸」。<sup>179</sup>顯然這兩種說法是互為矛盾的。究竟何者更切合實情呢？前一說的作者金應徵，為文之意本在表達對當時主政者課徵門攤商稅的不滿；後者則出自里人馬良臣〈甬里賦〉中的一段，意在歌頌甬直的富庶。二者可能各有所偏。但如折衷其說，再觀察甬直鎮日後的發展，指出甬直在一五五〇年前後，已發展成一個三級的鎮恐怕沒有問題。明末清初以來，甬直鎮繼續成長，規模比一五五〇年前後較可具體掌握，這以後再論。

陳墓鎮（吳71）在甬直鎮正南方十一公里處，為大小湖泊所環繞，周圍的陸地面積極為有限。由於地近淀浦河的河源，是蘇州通達松江府沿線的一個要站。當地自南宋以後漸成聚落。<sup>180</sup>明弘治（1488-1505）初年，鎮區本身「居廬櫛比，殆五百餘家，民物富庶」，<sup>181</sup>已符合本文第三級鎮的分類標準。如進一步參照清代狀況，陳墓長期以來的變化似乎不大。至於弘治迄一五五〇年前後，鎮的規模如無擴張，大概也還維持在弘治年間的水準。就當時而言，也算是一個較大的聚落了。

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去除上述市鎮分佈範圍後，就是吳縣西半部大運河通過地區、吳江縣全部和部份的青浦縣境。該區水域面積較前一部分更廣，但市鎮數量反而較多。更特別的，就是多數鎮的規模都較蘇南一般所見者為大。本區內最重要的商業聚落，毫無疑問的就是蘇州府城（吳39）。儘管宋元以來一直到明初，因政權更替而迭遭戰亂波及，蘇州城的盛衰難免曾有波動起伏，但這並不影響其始終作為蘇南地區第一大商業聚落的地位。一直到明中葉時，情形依舊如此。歷來有關蘇州城本身的論述已多，此地不必贅述。現只討論其外圍地區市鎮發展的情形。

<sup>179</sup> 《吳郡甬里志》，頁408。

<sup>180</sup> 《陳墓鎮志》（乾隆三十五年〔1770〕），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6集，頁280。

<sup>181</sup> 《陳墓鎮志》，頁305。

表七：明中葉（1550年止）位於吳縣境內大運河週遭市鎮

	1	2	3	4	5	6	7
圖一市鎮 代號	吳14	吳23	吳26	吳31	吳37	吳38	吳42
市鎮名稱	黃埭市	許市鎮 (許墅)	陸墓鎮	山塘	楓橋	月城市	光福鎮
	8	9	10	11			
圖一市鎮 代號	吳49	吳52	吳53	吳68			
市鎮名稱	橫塘鎮	木瀆鎮	新郭鎮 (新郭橋鎮)	橫金鎮 (橫涇鎮)			

到一五五〇年止，蘇州城以外吳縣境內劃歸大運河中貫地區的市鎮共有十一個。其中山塘（吳31）、楓橋（吳37）和月城市（吳38）最貼近蘇州城。山塘之作爲市鎮，僅見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版的《長洲縣志》。楓橋鎮則始見於康熙二十三年的《長洲縣志》，稍後的一些方志中尙有著錄，但道光以後就都不見了。月城市則早在明正德元年（1506）的《姑蘇志》中就以市鎮之名出現，在以後的一些地方志中猶再出現，但同樣於道光朝以後，也不再見載於地方志中。記錄雖如此，但卻不可據以斷言這三鎮後來並不存在。這其實牽涉到蘇州城本身擴張的問題。

楓橋鎮（吳37）其實早在明嘉靖初年，已是「由南濠至楓橋將十里，人煙相續，而楓橋爲盛。凡上江、江北所到菽麥棉花大貿易咸聚矣」。同時間的記錄又說：「楓橋地方，此處尤繁盛，菽麥棉花商船千百……。」<sup>182</sup> 月城市（吳38）更早見於明正德初的地方志，當時已是「兩京各省商賈所集之處」。<sup>183</sup> 山塘（吳31）雖僅見於康熙年間方志，當時「儲積商賈亞於楓橋，而川廣諸貨亦駢集焉」。<sup>184</sup> 如此光景，當然非可一蹴而成。上溯至一五五〇年前後，恐怕已頗具

<sup>182</sup> 嘉靖《吳邑志》（嘉靖八年〔1529〕），頁1037-1038, 1041。

<sup>183</sup> 正德《姑蘇志》，18：3a-4a。

<sup>184</sup> 康熙《長洲縣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8：1a-11a。

規模。康熙以後的方志雖不記其爲鎮，但並不表示鎮已消失。至少乾隆時宮廷畫家徐揚寫實的《乾隆盛世滋生圖》，具體展現山塘當時的商業盛況，就是一個明證。

上述三鎮之所以未能如一般源遠流長者，有系統地見載於方志中的市鎮門類，主要可能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然。山塘距蘇州城不過只有1.6公里，「與閶門相聯屬爲附郭地」。<sup>185</sup> 楓橋距城三公里，位於大運河入蘇州城的轉折處。月城市則出閶門就是。如此地近蘇州，沿路又「人煙相續」，揣摩時人可能多將此三鎮與蘇州城視作一體，以至於地方志的撰者，也就不必刻意在市鎮卷中強調其之獨立存在了。

山塘、楓橋和月城市就如眾星拱月般環繞著蘇州城。三鎮的發展，本質上乃代表著蘇州城本身向外的擴張。這就像十九世紀末以來，上海以今日南市爲主的老城區不斷向外擴張，進而與周圍整合成一體一樣。不過，近代以來的上海大都會區越擴越大，十六世紀初以來的蘇州都會區一直到十八世紀的乾隆年間，仍侷限在同樣的範圍內。兩相對照蘇州和上海的歷史，傳統格局內的都市發展與西力介入後的情形，顯然是判然有別。

蘇州城的北部和東北部地區，有黃埭（吳14）、許市（吳23）和陸墓（吳26）三個市鎮。黃埭市和陸墓鎮都在蘇州城齊門外。黃埭市離城較遠，約在城西北方十四公里處。作爲鎮出現的時間很早，明正德年間即已被地方志著錄爲市。但終明清之世，各種地方志捨其名以外，與鎮相關的記載幾乎是零。只有民國時期的《黃埭志》曾說：「黃埭鄉民大率以種稻爲業，婦女勤工作，或織席、織履，或績麻、績苧，各安其業。」<sup>186</sup> 然而這只泛論鄉民如何，並不提鎮上的情況，似乎仍是鄉、鎮不分的局面。陸墓鎮距離蘇州城僅有3.3公里左右，情況與黃埭市近似，鎮同樣在明正德年間已出現，也只有在道光時期的地方志說其地「居民多造窯及織汗（？）」。<sup>187</sup> 根據上述記載，實難判斷兩鎮一五五〇年以前的規模。不過，時至今日這兩個鎮都還存在，而且規模在現存各鎮中也算是較大的。是故，研判其爲二級鎮，或許不算離譜。

許市鎮（吳23）地跨蘇州城西北的大運河兩岸，與黃埭、陸墓相比，其發展際遇大相逕庭。當地早在十五世紀中葉以前，已經是「民際水而居，農賈雜處，

<sup>185</sup> 康熙《長洲縣志》，8：1a-11b。

<sup>186</sup> 《黃埭志》（民國十一年〔1922〕），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7集，頁570。

<sup>187</sup> 嘉慶《蘇州府志》（道光四年〔1824〕），28：7a-b。

爲吳中一大鎮。自景泰間（1450-1456）朝廷置樞司於此，舟楫停集，居民益繁」。<sup>188</sup> 所謂的樞司，就是明清時著名的內地常關——滸墅關。由於關徵所在，所有蘇南浙北經由大運河南來北往的商賈貨船，都必須停集於關前受驗納稅。許市原本已具規模，稅收新制導致當地的商旅居停、貨物轉輸等更加繁劇，鎮進一步的發展自可預期。目前雖無具體資料可以憑藉，但不難推測許市在一五五〇年以前，不但是一個三級的大鎮，而且是蘇南各鎮中的佼佼者。

出蘇州城渡過運河往西一直到太湖邊，是蘇南除太湖東、西山外，唯一山地丘陵分佈較廣的地區。一五五〇年前後，該區值得一提的，也是唯一的一個市鎮，就是光福鎮（吳42）。其早於正德元年（1506）的《姑蘇志》中便已被歸爲市鎮。光緒年間的《光福志》引明嘉靖《吳邑志》說：「光福鎮民纍千餘，街陌交通。」但緊接著又說：「自昔相傳，鎮在梓里，然文獻無徵。」<sup>189</sup> 事實也的確是如此。因爲嘉靖以後的崇禎、康熙、乾隆等《吳縣縣志》，都沒有再進一步對光福鎮的市況有所論述。其地處僻遠，與楓橋、許市之居於有利位置自不能相提並論。嘉靖年間其地雖有「鎮民纍千餘」一說，其實即使確有千戶之多，也應該是通指鎮轄區含四鄉之地在內的居民而言，並非以鎮區本身的人口爲限。推之一五五〇年前後，姑以一個二級鎮視之，或許還不失爲穩當。

由光福鎮到蘇州城，須循木光河東接胥江前行，兩河在木瀆鎮（吳52）相會。後者在蘇州城西南部，明中葉雖非樞關所在，卻與許市鎮同樣因商賈匯聚而成爲一個大鎮。環太湖周邊以水陸資源與蘇州城進行交流，當地實具樞紐的地位。凡吳縣西部環湖地區經木光河與蘇州城的商業往來固需取道於此，而吳縣西南部太湖東、西洞庭兩山透過胥江與蘇州城來往，也必須經過木瀆鎮。木瀆鎮在後一路線的重要性往往更勝過前者。這可由明清時洞庭東、西山商人在國內發展成一大商幫，進出都取道於此所體現。

至晚在明中葉時，太湖「西洞庭周遭八十餘里，……奧壤稍開阡陌，然廣不及山之一二，土人無田可耕，……稍有資蓄則商販荊、襄，涉水不避險阻，……家戶饒裕，……有『西富』之謠」。東洞庭則「居民寇西洞庭爲繁，聚族而處，久成港陌。……編民亦苦田少。不得耕耨而食，并商遊江南北，以通齊、魯、

<sup>188</sup> 萬曆《長洲縣志》（萬曆二十六年〔1598〕），頁390。

<sup>189</sup> 《光福志》（光緒二十六年〔1900〕），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7集，頁17。

燕、豫，隨處設肆，博錙銖於四方，以供吳之賦稅」。<sup>190</sup> 洞庭東、西山商人的出入必經木瀆。而透過木瀆鎮的中介，「洞庭兩山出產蔬果以及（木瀆）本地所出糟酒米布等類入（蘇州）城發賣」。反向行之，則又「貿易客貨悉從（蘇州）南濠、楓橋轉販」而來。<sup>191</sup> 長期以來做為東西洞庭山與蘇州城之間出入的門戶，木瀆鎮可說是隨著東西洞庭山的發展而發展。時至今日，木瀆在吳縣境內單以人口計，於諸市鎮中的數量僅次於許市鎮，這似乎自有其一定的歷史淵源。

迄一五五〇年為止，上述各鎮外，吳縣境內還有較次要的橫塘（吳49）、新郭（吳53）和橫金（吳68）三個鎮。三者都始見於正德元年的《姑蘇志》，但在嘉靖、崇禎、康熙、乾隆以及道光朝的蘇州府志或吳縣縣志中，與鎮相關的記載卻少之又少。橫塘與新郭鎮都臨近蘇州城，地處運河邊。橫金離城較遠，介於木瀆與蘇州城之間，也是洞庭東山到蘇州城必經之地。明代三鎮都產酒，有所謂「新郭、橫塘，比戶造釀，燒糟發客。橫金下保水東人並為釀工，蘇屬州縣以及南都皆用之。」<sup>192</sup> 又明清時橫金、橫塘居民除釀酒外，業搾油、屠宰者也很普遍，其市場則多指向蘇州城。<sup>193</sup> 顯然這些鎮的功能，基本都以供應蘇州城內的日用所耗為主。由於歷代方志提到這些鎮時，語意往往是合一鎮轄區內的各村而言，狹義之鎮的規模乃殊難斷定。但由當代反推，到一五五〇年止，其鎮區規模恐怕都不大。特別是新郭鎮，一九八〇年代全鎮住戶也不過千餘人罷了。<sup>194</sup> 即使登記人口可能少於實際住戶，也必須將一九四九年以後由於打擊與消滅商品經濟，導致蘇南市鎮普遍衰落這一事實納入考慮，回顧數百年前明中葉的新郭，規模即使較大，恐怕也還是相當有限。關於橫塘與橫金，其在一九八〇年代時各有居民三千餘人以上，可列入三級鎮之列。回到一五五〇年以前這個階段，將之定為二級鎮，以後各階段則皆歸為三級，這樣不免失之武斷，然而以後推前，一個鎮即使歷四百年以上，其發展也相當有限，是很可能的。

<sup>190</sup>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臺北：廣文書局，1979），19：19a-20b。

<sup>191</sup> 《況墅關志》（道光七年〔1827〕），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5集，頁146。

<sup>192</sup> 崇禎《吳縣志》（崇禎十五年〔1642〕），10：3a。

<sup>193</sup> 《橫金志》（光緒二十三年〔1897〕），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7集，頁301；《橫谿錄》（崇禎二年〔1629〕），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5集，頁278-279。

<sup>194</sup> 單樹模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詞典·江蘇省》，頁124。

有關吳縣境內的鎮，最後純就相關史料本身性質而言，尚有一事值得附帶一提。總體而論，明清地方志中所有與江南市鎮相關的史料本不豐富，而與吳縣地區相關者，則尤其疏漏。常識中以蘇州府城之繁榮富庶，周遭市鎮與之互動，可記者自應較多，但事實則全然相反。究竟這是相對於蘇州城獨特的發展，致使本地方志撰者的標準較高，而認為縣內其它市鎮無庸多論呢？或者是在蘇州城勢力的籠罩下，各鎮發展的空間有限，也就無足論也？基於本研究對蘇南市鎮的發展，一貫採從寬認定的原則，傾向於接受前一看法。除如許市、楓橋等鎮，到一五五〇年止可確定其已頗具規模外，其它離蘇州城稍遠的一些城鎮，在明清江南城鎮化的過程中，較之其它地區的一些鎮，也並非是無足輕重才是，或許只是被方志的撰者系統性地忽略而不談罷了。是耶非耶？或許值得再論。

吳縣以南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南方一隅與浙江接壤處，主要屬吳江縣，另有小部份屬青浦縣。從地圖上來看，江南所謂的水鄉澤國，在整個蘇南以之形容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可謂最為貼切，本地尤為典型。境內湖泊水域面積所佔之廣，堪稱是蘇南各地之最。而市鎮在當地的發展，就整個蘇、松、太地區而言，也最具獨特性。一是當其它各縣的市鎮數多開始出現大幅度增長時，吳江境內卻始終維持持平的狀態。全縣到一五五〇年左右共有十六個市鎮，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止，也不過增加到二十一個而已。這期間沒有出現過大幅新舊更替的現象。其次，包括縣城在內，全縣三級以上大鎮佔全部市鎮的比例，相對於蘇南其它各縣，始終偏高，占44%。附帶值得一提的是，明中葉以來各種地方志中有關吳江的市鎮史料相對豐富。內容涉及之市鎮規模及其在當地社會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等，記載之詳可說是在蘇南各縣中所僅見。如果史料豐簡本身，對市鎮活動的頻繁與否也具有一定的指標性意義，則吳江市鎮發展的特殊性就更為顯著了。以下且就一五五〇年以前，全縣市鎮的發展狀況進行說明。

最早在弘治元年（1488）的《吳江志》中就有記載說：「吳江為邑號稱富庶。在城有縣市，在鄉有四鎮及凡村落之大者，商賈之往來，貨物之貿易，紅塵滃然，自朝至暮無虛日云。」<sup>195</sup> 姑不論在鄉四鎮及村落之大者為何，形容一縣內各種聚落涉及之商業活動如此活躍，這是蘇南其它各縣所罕見的。

截至一五五〇年止，吳江的商業聚落當以縣治所在的松陵鎮（吳江2）最大。其地自五代梁開平三年（909）設縣以來，就一直是縣城所在，而聚落之形成

<sup>195</sup> 弘治《吳江志》（弘治元年〔1488〕），頁78。



當在此之前，因此誠可謂歷史久遠。從地理角度觀之，吳江縣城依傍南北大運河，去蘇州府城的盤門十四公里，是蘇、杭往來必經之地。此外，吳淞江上游與大運河在其北不過四公里處交會，蘇、杭和上海地區之間的來往，也以取道於此為便利。元代以前的吳江縣城，「自縣治達於四門內外，……無千家之聚」。<sup>196</sup>此局面到明成化、弘治年間時，則已大為改觀。弘治《吳江志》收錄了一則記載，撰文者先作一番回顧：「舊經云：（吳江縣）城無十里之方，市無千家之聚」，緊接著說：「今民生富庶，城內外接棟而居者煙火萬井。樓台亭榭與釋老之宮掩映如畫，其運河支流貫注入城，屈曲旁通，舟楫甚便，其城內及四門之外皆市廛闐闐，商賈輻輳，貨物騰湧，龍（攏？）斷之人居多，……出城東門，過長橋為江南市，居民又千百家，使舟官艦之往來，貢賦財物之接遞，朝莫（暮？）不絕，難以備述云。」<sup>197</sup>如果字面意義與事實相去不遠的話，則到一五五〇年為止，吳江縣城很有可能已發展成蘇州城與松江府城以外，蘇南地區最繁華的一個商業聚落。

就在吳江縣城日趨繁盛以前，在其東方七公里處另有一個大鎮——同里（吳江3）。宋元間同里已「民物丰阜，商販駢集，百工之事咸具，園池亭榭，聲伎歌舞，冠絕一時。明初居民千百家，室宇叢密，街巷逶迤，市物騰沸，可方州郡。」<sup>198</sup>由字裡行間判斷，這裡顯然都是就同里鎮的街區本身而言，並未包括鎮外四鄉之地，因此，同里很早就具小都會性質應該是可以確定的。進一步到明中葉的弘治年間，同里鎮本身「環以四柵，有巡司稅局，有洞真觀，仁濟、翊靈二道院，東岳行宮。居民千百家，貿易猶盛，亦一方之巨鎮也。」<sup>199</sup>這樣的敘述，就同時蘇南其它各縣的市鎮而言，也並不多見。又從軍事角度看，明末顧炎武論其地是吳江縣東的藩籬，寇從東部無論是崑山或松江地區進犯西部蘇、杭時，皆必取道於此。<sup>200</sup>此一要素反映在經濟活動上，同里自然是地居蘇南東西兩地物資交流的樞紐位置。這大概就是同里興起的基本原因之一。

同里與吳江縣城既然相去不過只有七公里之遙，同時俱屬較大的商業聚落，現存史料反映二者曾出現過明清蘇南各鎮之間少見的競爭關係。至遲到明初時，

<sup>196</sup> 乾隆《吳江縣志》（乾隆十二年〔1747〕），頁125-126。

<sup>197</sup> 弘治《吳江志》，頁80-81。

<sup>198</sup> 乾隆《吳江縣志》，頁124。

<sup>199</sup> 弘治《吳江志》，頁81-82。

<sup>200</sup>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16：11a。

同里鎮的繁榮原本還要在吳江縣城之上，因此有「國初市場騰沸，可方州郡，故局務稅額逾於縣市」這一說法。明中葉以來這種形勢開始有所轉變。時人所舉出的具體例證之一，就是在同里徵收到的商稅稅額漸不及在吳江縣城者。<sup>201</sup> 探討其因，吳江縣城沿運河而立這一優勢的地理位置，先天上就是同里所終難凌越的。其次，吳江縣城除一般民間商賈輻輳外，又有使舟官艦、貢賦財物的往來不絕，政治與經濟中心的合而為一，這對促進吳江城的繁華，理當有更積極的作用，而這是同里鎮所欠缺的。儘管如此，吳江縣城與同里鎮的高下之別，畢竟也只是相對而言。在另文論述明末清初以來的市鎮發展概況時，可以清楚看到二者長期以來皆在向上發展的脈絡中，同里鎮自明末清初以來持續發展，相形之下吳江縣城自是更見發達。

明中葉時，由吳江縣城沿運河南下行二十二公里可以到平望鎮（吳江22）。以其為中點，加上左右相去各約六公里的梅堰（吳江21）和黎里（吳江23）兩個鎮，恰好形成三大鎮並列的局面。平望的歷史最早可上溯到五代。當時地屬吳越，因罕罹戰火而漸成聚落。北宋時隨著東南的富庶漸甲於天下，平望開始有「大商巨舶奇貨充溢」。南宋定都於杭州，平望更成為畿輔要衝。元末張士誠據有平江路，在本地築城周三里。<sup>202</sup> 明弘治年間平望鎮有「居民千百家，自成市井」，同時還設有平望驛和巡檢司兩個小官方機構。<sup>203</sup> 鎮自「大明弘治以來尤盛」。<sup>204</sup> 因此，總結到一五五〇年止這個階段，平望發展成一個三級的大鎮應該是無庸置疑的。

地理位置上，平望明顯是蘇州、嘉興和湖州三府之間往來必經的通道。從商業流通的角度觀之，其地「宋元間（運河）兩岸邸肆間列，以便行旅」，這時平望繁榮的基礎，很可能還建立在運河南來北往的貿易流通上為主。這種情況明以來有所改變。原有運河南北走向以外，平望居中，東西向也就是蘇、杭與松江、上海地區之間的商業往來，比重應該日益增長。此體現於明清時人對平望鎮的形容：「西連具區（太湖），東接吳淞，南接嘉禾（嘉興），北走淮揚，蓋四達之

<sup>201</sup> 嘉靖《吳江縣志》（嘉靖四十年〔1561〕），頁96-98。

<sup>202</sup> 《平望鎮志》（雍正十年〔1732〕），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13集，頁14-15。

<sup>203</sup> 弘治《吳江志》，頁81-82。

<sup>204</sup> 嘉靖《吳江縣志》，頁96-98。

要津，估帆百貨之所爭集也。」<sup>205</sup> 這裡「東接吳淞」，意指與松江、上海地區的來往。此成為平望四達之一，相對也反映蘇南東半壁的日漸發展。較宋代蘇南最東尚侷限於以青龍鎮（青4）作為對外海貿重地時的格局，當有所突破。

京杭大運河到平望鎮後分叉，主幹南下嘉興府，旁支則西去湖州府。平望西側的梅堰鎮（吳江21）就在這一支的河邊上。明初當地尚以村名，弘治年間已發展成鎮。當時居民沿河兩岸分佈，有食店和酒館。幾十年後到嘉靖年間也就是一五五〇年前後，鎮上則有居民五百餘家自成市井。<sup>206</sup> 這雖然已達到本研究三級鎮的分類標準，但實際規模與繁榮的程度顯然遠不及同時代的同里與平望。即其日後的發展，也與之大異其趣。清乾隆年間曾有人將梅堰鎮的現況與明代嘉靖年間時相比，「今居民貨物日盛，遂稱為鎮云」。<sup>207</sup> 但是此後鎮則日益沒落。時至今日，梅堰鎮居民僅有八百二十五人而已，<sup>208</sup> 幾乎不及同里、平望的十分之一。雖然仍被列為市鎮，但實際已形同一個村落罷了。明中葉時梅堰的重要性原就不及其它同等級的鎮，其後雖漸盛而終衰，距離平望過近，商業發展機會多被其吸引而去或許是主要原因。不過，同樣與平望相去不遠，但在平望右側，面向松江地區之黎里鎮（吳江23）的境遇卻又不同。

黎里鎮位於東去上海、松江地區的淀浦河和黃浦江的河源處，周圍盡為河湖所圍繞。宋代當附近平望已蔚為商旅所聚的鎮市時，黎里還以村名。到高宗南渡這段期間當地又遭兵燹，焚掠甚慘，村亦亡。一直到元代才再形成聚落。<sup>209</sup> 明初的情況不詳。不過到明中葉弘治年間，黎里已號稱「居民千百家，舟楫輻輳，貨物騰湧，盛不減城市，蓋一邑之巨鎮也」。<sup>210</sup> 稍後一五五〇年左右，又有人說：「（鎮）地方四里，居民二千餘家，貨物貿易不減城市。」<sup>211</sup> 此後，歷明末以及清代，黎里仍然穩定發展，以迄於今。

空間上，黎里、梅堰二鎮，與大運河畔的平望鎮相去幾乎在等距之間，梅堰

<sup>205</sup> 《平望鎮志》，頁1。

<sup>206</sup> 乾隆《震澤縣志》（乾隆十一年〔1746〕），頁186；弘治《吳江志》，頁83-84；嘉靖《吳江縣志》，頁99-100。

<sup>207</sup> 乾隆《震澤縣志》，頁186。

<sup>208</sup> 單樹模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詞典·江蘇省》，頁151。

<sup>209</sup> 《黎里志》（嘉慶十年〔1805〕），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12集，頁253。

<sup>210</sup> 弘治《吳江志》，頁81-82。

<sup>211</sup> 嘉靖《吳江縣志》，頁96-98。

的發展潛力可能為平望所奪，但何以黎里則不然呢？一個可能的解釋，還是脫離不了當地與蘇南東半壁的關係。現有史料雖然看不出黎里在明代的商業機能與商品流向，但根據後世的情況可試做一些揣測。清末開港通商以來，絲為貿易大宗，浙江湖州府所產一向甲天下，所有東運上海出口者，都取道於平望與黎里鎮。<sup>212</sup> 如果說宋元時，蘇南商旅側重在西半部沿大運河南北向的流通，元明以來隨著蘇南東半部的逐步開發，蘇南東西兩半之間的商業往來也漸具份量。平望進一步的發展，一部份拜其之賜已如前述。黎里也很可能是順著同樣的大勢才發展起來的。因此黎里的興起自然要晚於平望。而有關蘇南由西半部向東拓展的大勢，還可由黎里東行更近松江地區的金澤鎮（青59）的歷史，作進一步的說明。

金澤是明中葉時青浦縣位於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內唯一的一個大鎮，四周圍皆水。其地南北向當江蘇浙江的交界處，東西向則位於松江與蘇州兩府交會的前沿地帶，而且恰好在溝通蘇、松之間水路的中間位置。相傳遠在宋代金澤的規模曾一度可與舊青龍鎮相匹敵，然而史料無憑，這只能當作傳說看待。<sup>213</sup> 明代可確知的是，正德年間其地即已成鎮，當時且設有巡檢司，<sup>214</sup> 此外的情況就僅能憑清代的記載推估而得了。

據載，清初金澤有居民數千家。<sup>215</sup> 不過，即使衡諸於今日，這也應該是就整個金澤鎮包括轄區內四鄉的住戶而言，並非僅限於狹義的鎮區本身居民。回首清初，情況更當如此。不過，這也並不妨礙金澤長久以來，作為青浦西部僅次於朱家角（青45）的一個大鎮這一事實。<sup>216</sup> 清代金澤地區婦女無論貧富無不紡織，肆中且有專門收布之所，叫做花布紗莊。<sup>217</sup> 又紡紗織布必備的工具——錠子與紡車，金澤所產的也特別有名，除松江本地外，西自吳江，南自嘉興，北自崑山，甚至常熟等地的人，也都前來購買。另加上傳統謝家所製的紡車，久而久之，乃有「金澤錠子謝家車」這樣的諺語流傳於世。<sup>218</sup> 當清末浙江湖絲取道於

<sup>212</sup> 《黎里續志》（光緒二十五年〔1899〕），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12集，頁332。

<sup>213</sup> 《金澤小志》（道光十一年〔1831〕），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2集，頁478。

<sup>214</sup> 正德《松江府志》，頁333。

<sup>215</sup> 《金澤小志》，頁436。

<sup>216</sup> 《金澤小志》，頁417。

<sup>217</sup> 《金澤小志》，頁417, 432。

<sup>218</sup> 《金澤小志》，頁432。

平望、黎里轉運上海出口時，金澤是必經的一站。反其道而行，當明代金澤隨松江棉布業發展而興時，本地以外松江地區許多棉布運往蘇州轉銷全國各地時，金澤應該也是要道之一。更偏西黎里的興起，顯然也與此脫不了關係。至於梅堰鎮在大運河的旁支上，就沒有這個條件了。

明中葉前後，平望三鎮、吳江縣城和同里鎮南北兩線之間廣大範圍內，只有龐山村（吳江4）、八坼（吳江9）和充浦（吳江10）三個鎮。龐山村去縣城不到三公里，弘治年間「居民皆業園種蔬，遠近取給。每晨鐘初靜，黃童白叟纍纍然，數百擔入城變易，皆土產也」。<sup>219</sup> 一五五〇年以後，龐山村不再出現於任何與吳江有關的地方志中。很可能該地本屬吳江縣城的副食供應基地，居民多入城交易，村本身則非交易之所，日久也就疏於記載了。充浦地近太湖，弘治年間尚設有簡村巡檢司。這顯示當地治安機能可能重於商業機能，因為鎮當時雖曰「居民自成市井，有魚稻蠶絲之利」，<sup>220</sup> 然而此後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地方志市鎮欄中始終不會有任何與充浦有關的記錄。一九八〇年代其地再被列為商業聚落時，全鎮登記的居民數也不過四百六十人而已。<sup>221</sup> 充浦從未成為一個較重要的鎮，這或許也可作為旁證之一。

舊龐山村、八坼和充浦三鎮，自明中葉延續至今，且較有規模者，唯獨八坼鎮而已。其地位於吳江縣城與平望鎮中點位置的運河邊上，明初居民尚僅數十家，當時可能還是村而非鎮。<sup>222</sup> 弘治年間當地有食店酒館以待行旅。<sup>223</sup> 明中葉進一步發展成一個有三百餘家的二級鎮。<sup>224</sup> 明季遭兵火，民多蕩析。清初漸次安集。<sup>225</sup> 時至今日，居民約兩千四百人，仍維持一個二級鎮的規模。其地當南北要衝，為商旅所必經，這可能是維繫該鎮經久不墜的主要原因。至於周圍地區生產力的積累對促進鎮的繁榮，則可能助力有限。事實上，平望三鎮與吳江縣城、同里鎮兩線之間的廣大範圍內，即使到一九四九年以後，始終也沒有出現過任何規模較大的市鎮，可能就與此有關，而這又可能受制於本地水域面積的過於遼闊。

<sup>219</sup> 弘治《吳江志》，頁83-84。

<sup>220</sup> 弘治《吳江志》，頁82-83。

<sup>221</sup> 單樹模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詞典·江蘇省》，頁150。

<sup>222</sup> 乾隆《吳江縣志》，頁125。

<sup>223</sup> 弘治《吳江志》，頁82-83。

<sup>224</sup> 嘉靖《吳江縣志》，頁99-100。

<sup>225</sup> 乾隆《吳江縣志》，頁125-126。

在平望分叉的大運河，西支經梅堰後繼續西南流，在吳江境內最後還通過雙楊（吳江25）和震澤（吳江28）兩個鎮；運河主幹南去杭州，在吳江與嘉善縣交界處有新杭市（吳江33）。目前研判，這三鎮在整個明清蘇南城鎮化過程裡曾扮演過較重要角色的，只有震澤和新杭市兩個。雙楊雖在明弘治年間居民已自成市井，<sup>226</sup>數十年後到一五五〇年左右，有居民三百餘家，<sup>227</sup>但以後經濟長期遲滯。至少在近三百年後的乾隆年間，大體則仍維持與一五五〇年前後同樣的規模。<sup>228</sup>時至今日，雙楊已降成一個村。由於去震澤只有三公里之遙，隨著震澤的發展，雙楊的功能或有可能受其抑制，鎮因而不長反衰。

震澤（吳江28）據說在南宋已然成鎮。<sup>229</sup>不過，元代王士杰的詩中卻說其地「村市蕭條數十家」。<sup>230</sup>果其然，則所謂在南宋已成鎮的這個鎮與當時十二公里外的平望相比，應該是遙不可及的。明成化朝，震澤成爲一個有三、四百人家的聚落。<sup>231</sup>稍後，弘治元年（1488）的史料說其鎮：「有巡司寺觀，居民亦千百家，自成市井。」<sup>232</sup>再後，一五五〇年前後的嘉靖年間，則「地方三里，居民千家」。<sup>233</sup>據此，震澤在弘治與嘉靖朝相去六、七十年間，變化並不大。但在此之前，成化朝到弘治朝不過二十幾年，震澤竟然在這麼短的期間由三、四百家變成一個千百家的聚落，規模擴大一倍以上，這在傳統社會中應該是極其不易。

提到震澤於成化中有三、四百人家的，是清乾隆朝人。弘治與嘉靖年間的情形，則都出自當時人的記載。後者可信度應該較前者爲高。因此，震澤在成化朝恐怕不只有三、四百人家而已。不過，無論如何，震澤到明中葉，發展成一個三級大鎮，大概無庸置疑。清代震澤的商業活動與以下所要提到的新杭市一樣，都以絲的產銷爲主要。換言之，震澤發展的契機應與絲業有關。其在明代應也如此。不同於迄今所論蘇南各鎮或以棉，或以鹽，或以米業爲重，震澤首要的經濟活動轉以絲業爲主，這反映其地已與浙北的自然生態環境更爲契合了。

<sup>226</sup> 弘治《吳江志》，頁82-83。

<sup>227</sup> 嘉靖《吳江縣志》，頁99-100。

<sup>228</sup> 乾隆《震澤縣志》，頁185-186。

<sup>229</sup> 單樹模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詞典·江蘇省》，頁149。

<sup>230</sup> 弘治《吳江志》，頁862-863。

<sup>231</sup> 乾隆《震澤縣志》，頁184-185。

<sup>232</sup> 弘治《吳江志》，頁81-82。

<sup>233</sup> 嘉靖《吳江縣志》，頁96-98。

一五五〇年前後與震澤鎮可以等量齊觀的新杭市（吳江33），恰好位於吳江與浙江嘉興縣的交界。與其一水之隔，就是嘉興的王江涇鎮。如果無視於人爲的行政區分，則新杭市理當與王江涇鎮合併觀察才更具全面性。

歷來方志與吳江縣有關者，對於新杭市的記載都異常疏略，而嘉興縣論王江涇鎮者，流傳至今有《聞川志稿》專書。由王江涇所在的位置觀之，新杭市地處北邊，是當地人俗稱的「河北埭」。<sup>234</sup> 弘治元年的《吳江志》說其地：「居民頗盛，自成市井，其南岸即浙之王江涇。」<sup>235</sup> 在此之前，新杭市的概況史無可徵。相對於此，王江涇鎮已知的歷史就要早得多。先是五代錢鏐開國時，有聞氏來此定居。宋代則開始有聞川市之名。<sup>236</sup> 既稱市，當時可能已發展成一個商業性的聚落。元代相傳因巨姓王氏、江氏建房貿易於此，市乃改稱王江涇。<sup>237</sup> 明嘉靖以前，王江涇已號稱「鎮當要衝，闐闐殷闐」，<sup>238</sup> 再加上與之同時，「居民頗盛，自成市井」的新杭市，則一五五〇年前後，這是一個三級的商業聚落，應該很有可能。

清代王江涇鎮民「多織繒爲業，日出千匹，衣被數州郡」。<sup>239</sup> 而新杭之所以盛，清人宋景和的一首詩〈新杭市〉最能具體反映。該詩說：「錦綾織就費千絲，花樣新鮮是折枝。估客不辭千里遠，新杭橋外卸帆遲。」<sup>240</sup> 顯然新杭市的貿易也以絲爲大宗。兩地在明代日漸繁興，幕後主要推動的力量當亦不外乎此。

以上綜述吳江旁及部份青浦地區迄一五五〇年止既存各鎮的概況。本文前曾一再點出明清吳江市鎮發展的一些特殊性。現綜合剛討論過各鎮的基本性質，且就此特殊性的成因試做一些說明。首先是有關吳江地區市鎮數量始終偏低這一現象。在各種作用力中，先天自然環境首應考慮。原來吳江水域面積極廣，各種人文聚落分佈的空間限制本多，而可形成具有商業機能的市鎮當然會少，這無庸說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道理。其次，以縣爲單位，關於吳江大鎮比例在蘇南各縣中居

<sup>234</sup> 《聞川志稿》（宣統三年〔1911〕），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19集，頁585。

<sup>235</sup> 弘治《吳江志》，頁83-84。

<sup>236</sup> 《聞川志稿》，頁567。

<sup>237</sup> 《聞川志稿》，頁567, 584。

<sup>238</sup> 《聞川志稿》，頁570。

<sup>239</sup> 唐佩金，《聞川綴舊詩》，轉引自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頁429。

<sup>240</sup> 《盛湖志》（民國十四年〔1925〕），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11集，頁455。



最高的問題。吳江有大運河流經其中，又是吳淞、淀浦、黃浦等河川的發源地，地理位置上正當蘇、杭南北向和蘇、松東西向的樞紐，且毋論吳江各鎮興起的原因為何，一旦形成後，隨著蘇南東半壁的拓展，東西向交流的日益加強，原來地處蘇、杭南北要道上的市鎮，同時轉成為蘇南東西之間往來的要津，無形中乃更強化其原有的優勢地位，從而促成市鎮大者恆大的現象。相對這又抑制了一些新市鎮與舊有小鎮的發生和發展。明清以迄於今，吳江市鎮數量何以一直偏低或可做如是解釋。

最後從更廣泛的基礎考慮，明清時代江南的絲綢業獨步全國，一般通說養蠶種桑集中在浙江杭嘉湖平原與蘇州的沿太湖地帶。後者所指的，其實就是吳江地區。<sup>241</sup> 雖然行政區劃上吳江屬於蘇南，但從農工活動的基本性質觀之，該地其實與浙北合為一個經濟區更為合適。絲織業在江南自古以來就是一種本土產業，比諸蘇南東半部由外傳入的棉織業，可謂源遠流長。絲織業帶動地域開發的悠久性，可能也有助於吳江總體城鎮化穩定與持續的發展，因此在一五五〇年以前，當地就已出現前所引的「在城有縣市，在鄉有四鎮及凡村落之大者，商賈之往來，貨物之貿易，紅塵滃然，自朝至暮無虛日云」，這一蘇南地區少見的特殊景象。

## 結論

本文在以明中葉時，蘇州、松江與太倉二府一州地區既存市鎮的緣起、概況、性質、分佈及其與周邊的關係，為地域開發的指標，觀察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實況。經分區逐個考察蘇南各主要市鎮後，認為整個蘇、松、太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其實可以藉著當地發展層級最高，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商業聚落——蘇州城本身的興衰變化作為背景，襯托說明之。這恰好有王錡在《寓圃雜記》中一段揉合前輩記錄與個人親身體驗的記事，具體而生動地描述了明初以來蘇州城的變化。

王錡說：「吳中素號繁華。自張氏之據，天兵所臨，雖不被屠戮，人民遷徙，實三都，戍遠方者，相繼至。營籍亦隸教坊，邑里蕭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正統、天順間，余嘗入城，咸謂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迨成化間，余恆三、四年一入，則見其地迥若異境。以至於今，愈益繁盛。閭閻輻輳，萬瓦整

<sup>241</sup> 范金民、金文，《江南絲綢史研究》（北京：農業出版社，1993），頁80-82。

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sup>242</sup> 這裡所說天順朝最末一年為西元一四六四年，去明開國已有百餘年左右，蘇州城這時還只是「稍復其舊」而已。又歷成化朝，也就是一四六五到八七年間，蘇州城的情況開始明顯好轉。王錡最後稱，其為文當時的蘇州城則愈益繁盛。這當然是去成化朝又有一段歲月，乃與本研究止於明中葉的一五五〇年前後，實已相去不遠。

明中葉，蘇南各地一百六十一個市鎮的歷史，幾乎無一有王錡筆下的蘇州城這般清楚的發展輪廓。一般一、二級的小鎮固然如此，史料即使相對豐富或地當行政中樞的三級鎮和州、縣城等，也都一樣。不過，退而求其次，歸納全部三級以上鎮個別的歷史，還是可以理出一個大致的趨向。這也就是蘇南地區在宋元已蔚為大鎮的為數極少；宋元始成聚落，入明以後發展成鎮市的居多。這其中又以成化、弘治以來形成大鎮者較明確可考。在這之前，階段性發展的動向不知者不論，但假設一般大鎮多於成、弘以後方具體成形，這倒是與王錡筆下的蘇州城，由逐漸復原進而趨於繁盛這一關鍵時刻大致契合。

蘇州城於明開國百年以後「稍復其舊」，但放到整個蘇南的大環境中，從市鎮空間佈局的角度觀之，此雖舊而猶新，因為這是一個已完全嵌入新市鎮空間架構裡的蘇州城。伴隨著蘇州城進一步的繁華，這個空間架構也將持續轉化。到一五五〇年為止，這個空間架構所反映的蘇、松、太地區總體的區域發展動向，基本上或可作如是觀：首先，南北向流經本文所說的大運河與湖群低地區的大運河，西接長江，北上黃、淮，與全國其它各主要區域相通，南下則經吳江縣與杭嘉湖地區連成一線，進一步循錢塘江而上，還可進入閩廣和贛江流域。有鑑於運河流經的蘇州城本身，自古以來就在江南地區水運交通和社會經濟活動方面居樞紐的地位，大運河沿岸乃構成當地最古老的開發區，可說是不言而喻。其次，黃浦江以西和以北範圍，也就是鹽鐵塘主幹區內，所有東西向與大運河縱軸相交的主要河道從圖一上看來，宛如是幾條以蘇州、吳江城為原點，伸向蠻荒之地的觸鬚，僅見的一些市鎮多沿著這些河道分佈。這彷彿象徵著歷來蘇、松、太地區的先民，正循著這幾條水運幹道向外拓殖。至於黃浦江以東和以南的淀南浦東區，因當地自古以來多鹽場，有些市鎮很早因鹽業而興，分佈型態乃自成格局。不過，本地總體開發程度相對於大運河沿線地區之落後，當是明顯的事實。

唐宋以來的江南號稱是天下軍國重賦所倚，明清時更是一般史學家所謂「資

<sup>242</sup> 明·王錡，《寓圃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五，〈吳中近年之盛〉，頁42。

本主義萌芽」的核心區。如果說「資本主義萌芽」現象的發生，始自一般所接受的明中晚期，則以蘇、松、太地區市鎮發生與分佈的型態來看，迄一五五〇年止，當地的社會經濟活動，似乎正以點或線的形式，由內陸向海疆地區逐步擴張。如此一來，傳統所謂經濟高度發展的蘇南地區，其實又有核心與邊陲之別。這個時候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經濟，實富有一層非常濃厚的拓殖性色彩。一般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此時在蘇南本質上或可視作是人們正不斷向傳統土地邊際效益較低的地區拓展，從而引發一連串社會經濟活動較以往顯得較為熱絡的景象罷了。如與清代乾嘉時的情形相比，套用「資本主義萌芽」論，此刻或可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的萌芽期了。

最後還順便一提的是，到一五五〇年代止，蘇南地區內部向邊際地帶的開拓，主要指的是向近海環岡身的棉作地帶的發展。這種勢力最終促成棉業發展、新地域的開發和市鎮興起，三位一體，相輔相成。然而同時期的浙北杭嘉湖地區，當地絲業的發展既源遠流長，又沒有一個像蘇南岡身地區那樣明顯的新拓殖帶，影響所及，本地城鎮化的性質，是否與蘇南地區會有所不同？或許更基本的一個問題是，浙北與蘇南儘管同屬江南，但是否應根本區分為兩地，對各自在明清總體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先有更深一層的了解，爾後再做相互的比較？欲深入了解明清全國各地基本的社會經濟結構及其運行狀況，這或許又是其中一個值得考慮的研究取向。易言之，地域概念上僅籠統的一個江南地區，待細究者即已甚多，而想充分掌握明清全國社會經濟的基本性質，其之複雜尤可想而知也！

（本文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與地方志書

- 《丹午筆記》，清·顧公燮撰，點校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清·顧炎武，臺北：廣文書局，1979。
- 《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明·陳子龍等選輯，據明崇禎年間雲間平露堂刊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匏翁家藏集》七十七卷，補遺一卷，明·吳寬撰，《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寓圃雜記》，明·王錡撰，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 《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清·顧祖禹，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 弘治《太倉州志》十卷，明·李端修，桑悅纂，明弘治十三年（1500）刊，清宣統元年（1909）刊集刻太倉舊志五種本。
- 嘉靖《太倉州志》十卷，明·周士佐修，張寅纂，《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20影印崇禎二年（1629）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90。
- 崇禎《太倉州志》十五卷，附圖，明·張采等修，明崇禎十五年（1642）刊，清康熙十七年（1678）修補本。
- 民國《太倉州志》二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王祖畬等纂修，民國八年（1919）刊本。
- 《太倉縣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
- 淳祐《玉峰志》三卷，宋·凌萬頃、邊實同撰，清·吳縣吳翌鳳手鈔本。
- 弘治《吳江志》二十二卷，附錄一卷，明·莫旦撰，明弘治元年（1488）刊本。
- 嘉靖《吳江縣志》二十八卷，附圖，明·曹一麟修，徐師曾等纂，明嘉靖四十年（1561）刊本。
- 乾隆《吳江縣志》五十八卷，首一卷，清·陳萇續，倪師孟、沈彤纂，清乾隆十二年（1747）刊本。
- 紹定《吳郡志》五十卷，宋·范成大撰，汪泰亨等增補，宋紹定二年（1229）李壽明平江府刊本。
- 嘉靖《吳邑志》十六卷，明·蘇祐修，楊循吉纂，《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10影印明嘉靖八年（1529）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90。
- 崇禎《吳縣志》五十四卷，明·牛若麟等修，明崇禎十五年（1642）刊本（缺卷五至六）。
- 《沙洲縣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

光緒《重修奉賢縣志》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韓佩金等修，張文虎等纂，清光緒四年（1878）刊本。

《奉賢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正德《姑蘇志》六十卷，明·王鏊等修，明正德元年（1506）刊本。

光緒《崑新兩縣續修合志》五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金吳瀾等修，清光緒六年（1880）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華中地方第19號。

正德《松江府志》三十二卷，明·顧清等修，明正德七年（1512）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華中地方第455號。

崇禎《松江府志》五十八卷，明·方岳貢等撰，據明崇禎四年（1631）刊本景照。

康熙《松江府志》五十四卷，序目圖經十卷，清·郭廷弼修，周建鼎等纂，清康熙二年（1663）刊本。

嘉慶《松江府志》八十四卷，首二卷，序圖一卷，清·宋如林修，孫星衍等纂，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刊本。

正德《金山衛志》二卷，附圖，明·張奎等修，明正德十二年（1517）刊本。

乾隆《金山縣志》二十卷，首一卷，清·常琬修，焦以敬纂，清乾隆十六年（1751）刊本。

《金山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萬曆《長洲縣志》十四卷，明·皇甫汈等撰，據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刊本景照。

康熙《長洲縣志》二十二卷，清·蔡方炳纂，據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序刊本景照。

萬曆《青浦縣志》八卷，明·卓鈿、王圻撰，據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刊本。

光緒《青浦縣志》三十卷，首二卷，末一卷，清·黎庶昌等修，熊其英等纂，清光緒五年（1879）尊經閣刊本。

《青浦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光緒《南匯縣志》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金福曾等修，張文虎等纂，清光緒五年（1879）刊，民國三年（1914）修志籌備處重印本。

嘉慶《常昭合志》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王錦修，清嘉慶二年（1797）刊本。

光緒《重修常昭合志稿》四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鄭鍾祥等重修，龐鴻文等纂，清光緒三十年（1904）活字本。

至正《重修琴川志》十五卷，宋·鮑廉撰，元·盧鎮補修，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續修刊本。

光緒《重修華亭縣志》二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楊開第修，姚光發等纂，清光緒四年（1878）刊本。

至正《崑山郡志》六卷，元·楊諤撰，元至正四年（1344）鈔本。

嘉靖《崑山縣志》十六卷，明·方鵬、楊逢時纂，《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9  
影印明嘉靖十七年（1538）刊本，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1。

《常熟私志》存三卷，明·姚宗儀撰，萬曆四十五年（1617）鈔本。

嘉靖《常熟縣志》十三卷，附圖，明·鄧穀撰，明嘉靖十八年（1539）刊配補影  
抄本。

《常熟市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萬曆《嘉定縣志》二十二卷，附圖，明·韓浚等修，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刊本。

乾隆《嘉定縣志》十二卷，清·程國棟纂修，清乾隆七年（1742）刊本。

光緒《嘉定縣志》三十二卷，首一卷，清·程其珏修，楊震福等纂，清光緒七年  
（1881）尊經閣刊本。

《嘉定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乾隆《震澤縣志》三十八卷，首一卷，清·陳和志修，倪師孟、沈彤纂，清乾隆  
十一年（1746）刊本。

民國《鎮洋縣志》十一卷，附錄一卷，附圖，王祖畬纂，民國八年（1919）刊本。

光緒《寶山縣志》十四卷，首一卷，清·梁蒲貴等修，朱延射等纂，清光緒八年  
（1882）刊本。

乾隆《蘇州府志》八十卷，首一卷，清·習禕、邵泰等撰，清乾隆十三年（1748）  
刊本。

嘉慶《蘇州府志》一百五十卷，首一卷，清·宋如林等修，石韞玉纂，清道光四  
年（1824）刊本。

《奉賢鹽政志》，柳國瑜主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

以下全出自《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1-12, 19集，上海：上海書店，1992。

《支溪小志》六卷，清·顧鎮編輯，清·周昂增訂。

《四鎮略蹟》，清·馬幼良。

《平望鎮志》四卷，首一卷，里人公輯。

《光福志》十二卷，首一卷，清·徐傳編，清·王鏞等補輯。

《安亭志》二十卷，清·孫岱，陳樹德纂。

《朱涇志》十卷，清·朱棟撰。

《江東志》十二卷，清·佚名纂。

《江灣里志》十五卷，附刊一卷，錢淦纂。

《吳郡甫里志》二十四卷，首一卷，清·彭方周纂修。

《沙頭里志》十卷，清·曹焯纂，陸松齡增訂。

《里睦小志》二卷，清·顧崇善纂。

- 《金澤小志》六卷，清·周鳳池纂，蔡自申續纂。  
《相城小志》六卷，陶惟坻修，施兆麟纂。  
《重輯張堰志》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姚裕廉、范炳垣纂修。  
《重輯楓涇小志》十卷，清·曹相駿纂，許光墉增纂。  
《續修楓涇小志》十卷，首一卷，清·程兼善纂。  
《望仙橋鄉志》，清·張啓泰輯，陸世益編。  
《淞南志》八卷，清·秦立纂。  
《盛湖志》十四卷，首末各一卷，清·仲廷機纂，仲虎騰續纂。  
《陳墓鎮志》十六卷，首一卷，清·陳桐隆原纂，陳樹穀續纂。  
《黃埭志》四卷，朱福熙等修，程錦熙纂。  
《黃渡鎮志》十卷，首一卷，清·章樹福纂。  
《聞川志稿》（又名《聞湖志稿》）二十卷，清·唐佩金纂。  
《蒸里志略》十二卷，清·葉世熊纂。  
《澹墅關志》十八卷，清·凌壽祺纂。  
《劉河鎮記略》十四卷，清·金端表纂。  
《黎里志》十六卷，卷首一卷，清·徐達源纂。  
《黎里續志》十六卷，卷首一卷，清·蔡丙圻纂。  
《橫金志》二十卷，附集文集詩各一卷，清·柳商賢纂，孔陟岵續補。  
《橫谿錄》八卷，附溪山一卷，明·徐鳴時纂。  
《璜涇志稿》八卷，清·施若霖纂。  
《錢門塘鄉志》十二卷，首一卷，清·童世高纂。

## 二、近人論著

王曾瑜

- 1993 〈宋代的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3.1。

何泉達

- 1991 〈吳中水利與濱海鹽利——兼論明清兩代上海鹽業衰頹的原因〉，《史林》1991.3：53-58。

李香芳

- 198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典·上海市》，北京：商務印書館。

洪煥椿

- 1988 《明清蘇州農村經濟資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范金民、金文

- 1993 《江南絲綢史研究》，北京：農業出版社。



范毅軍

范金民、夏維中

- 1993 《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范毅軍

- 1998 〈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9.3：87-134。  
2001 〈市鎮分佈與地域的開發——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大陸雜誌》102.4：160-191。  
2002 〈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3：443-552。

祝鵬

- 1989 《上海市沿革地理》，上海：學林出版社。

高王凌

- 1997 〈關於清代的江蘇經濟〉，《清史研究集》8：174-195。

張修桂

- 1998 〈上海浦東地區成陸過程辨析〉，《地理學報》53.3：228-235。

許滌新、吳承明

- 1985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傅衣凌

- 1957 《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單樹模主編

- 1987 《中華人民共和國詞典·江蘇省》，北京：商務印書館。

鄒逸麟

- 1980 〈上海地區最早的對外貿易港——青龍鎮〉，《中華文史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總13(1980.1)：119-129。

樊樹志

- 1990 《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鄭肇經主編

- 1987 《太湖水利技術史》，北京：農業出版社。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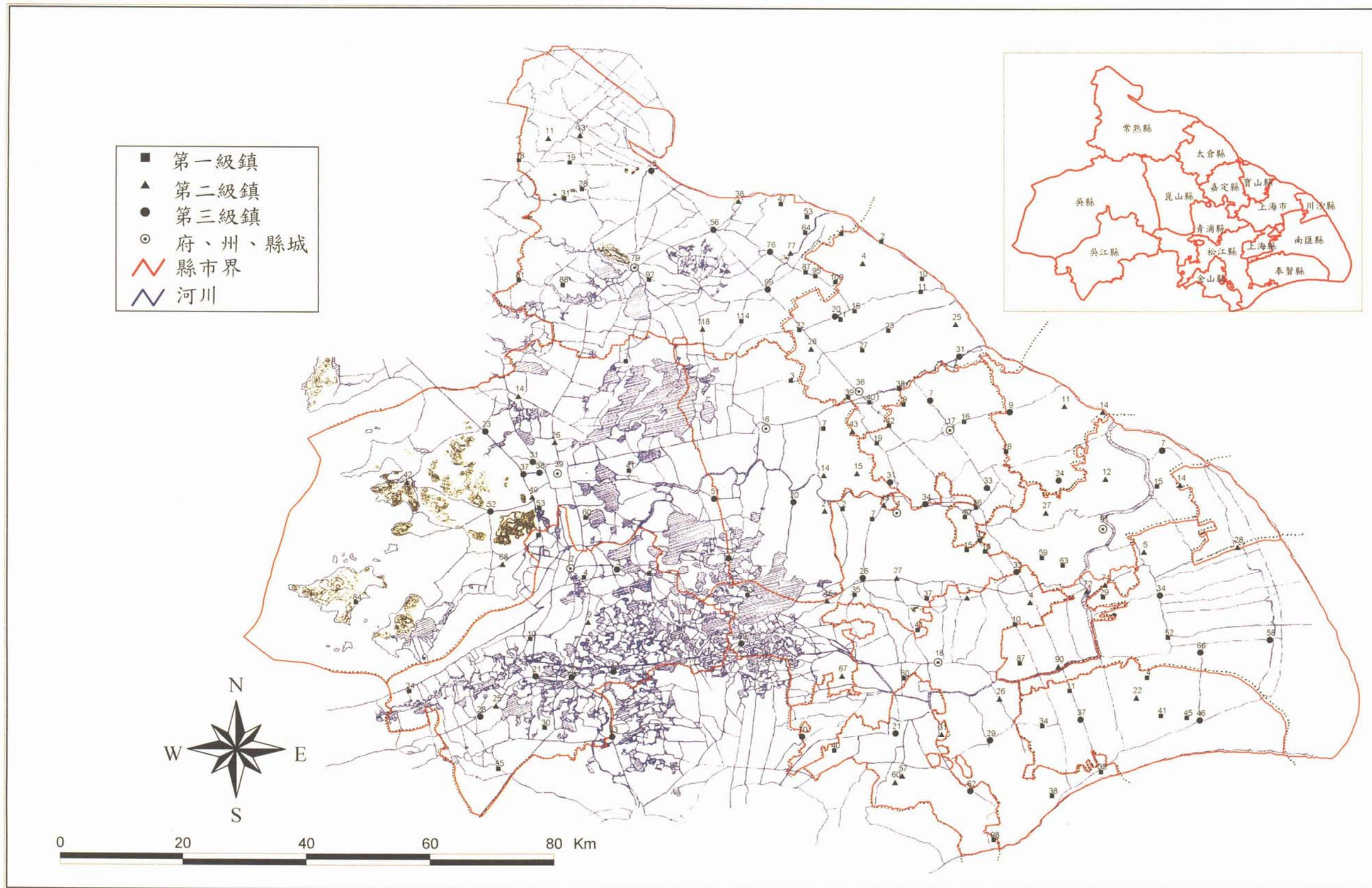
- 1970-1990 《江蘇省五萬分之一地形圖》，臺北。

魏嵩山

- 1993 《太湖流域開發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譙樞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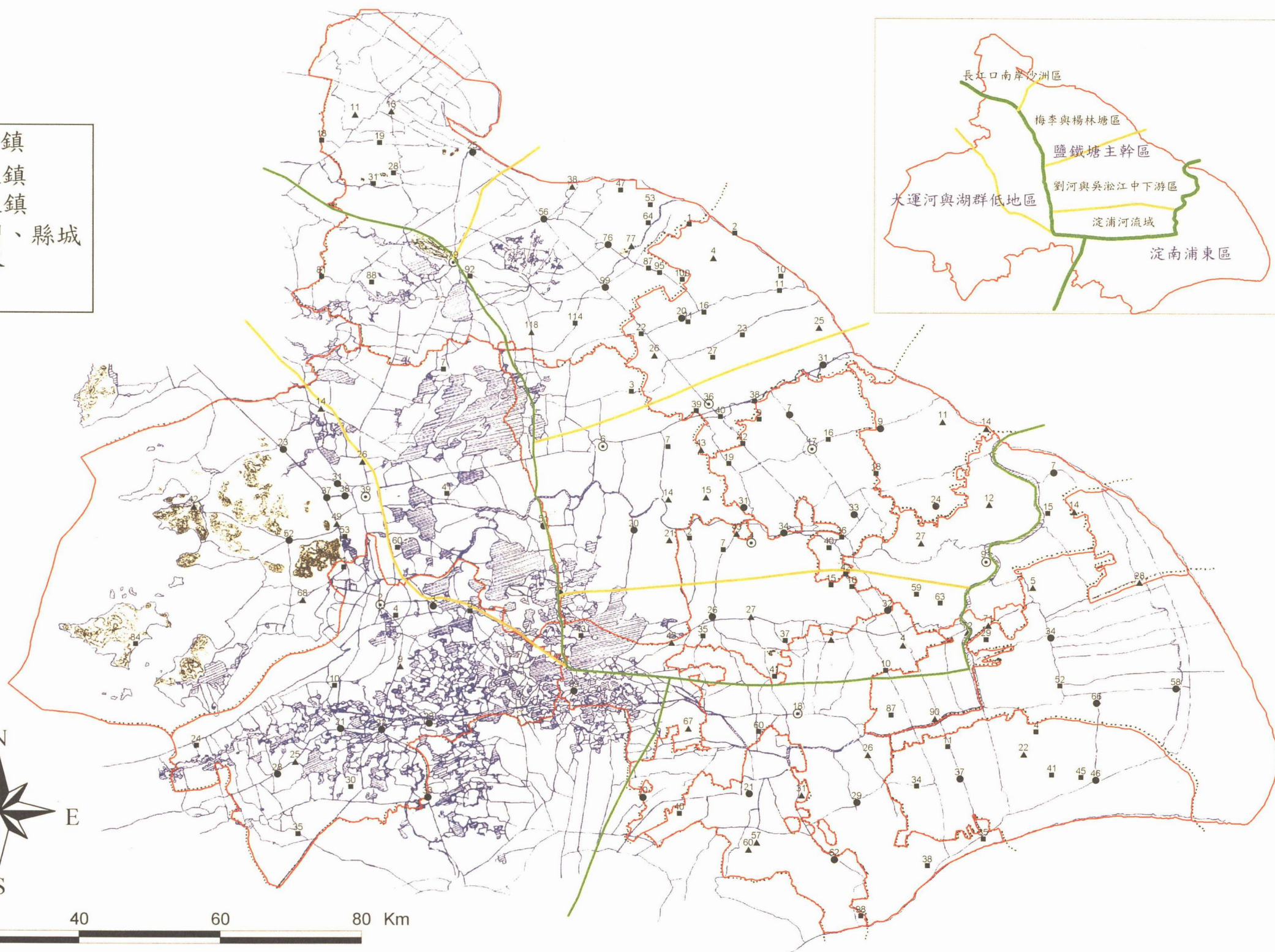
- 1980 〈青龍鎮的盛衰與上海的興起〉，《社會科學》1980.6：109-112, 93。



圖一：明中葉（1550 年止）蘇州府、松江府與太倉州地區市鎮分佈圖  
（分縣及區分等級大小）



- 第一級鎮
- ▲ 第二級鎮
- 第三級鎮
- ◎ 府、州、縣城
- 〰 縣市界
- 〰 河川



圖二：明中葉（1550 年止）蘇州府、松江府與太倉州分區市鎮分佈圖

## Market Tow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the East of Lake Tai during the mid-Ming Dynasty

I-chun F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appearance and expansion of market towns are important benchmarks for measuring socio-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reg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Ming-Qing er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efectures of Suzhou, Songjiang and Taicang (all of which belonged to Jiangnan's Sunan region), and is based o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expansion of market town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is area's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during the mid-Ming dynasty.

Up to the mid-M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nan region featured the opening up of uncultivated lands. If we sub-divide the Sunan region into three parts,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is feature was most obvious in the Yantie River basin, which was situated in the east of the Sunan region. Traditionally,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land utilization in that area was low. Only after cotton was successfully transplanted, and the cotton industry began to flourish, did the Yantie River basin begin to attract immigrants from the west of the Sunan region. This proved to be one of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that advanced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unan region during the mid-Ming.

**Keywords:** market town, regional development, mid-Ming dynasty, Suzhou Prefecture, Songjiang Prefecture, Taicang Prefecture